

目 录

- 愤怒的火焰 錢雪盛 韓徽惠 丁 玫 (1)
- 孙家的儿子 朱贊平 (15)
- 当我看到孩子們的笑臉时 張 淑 华 口述
鉄 嶺 橡 膠 厂 三 史 編 写 小 組 整 理 (31)
- 从黑夜到天明 彭景春 口述
馬凤舞 整 理 (43)
- 春天的馬蓮 潘映雪 (53)
- 三个年三十 丁立身 (65)
- 三进“連生店” 陈大娘 口述
賈恩和 整 理 (72)
- 半升米 傅 羣 (81)
- 評书演員話个昔 袁闊成 口述
赵 博 整 理 (89)
- 大学生 駱国翹 (100)
- 女教授 朱贊平 胡清和 (114)
- 桃李只等春风开 刘選秋 (126)

憤怒的火焰

錢雪威 韓敬惠 丁 玫

大連紡織廠庭院中心，聳立着一座紀念碑。碑上記載着這個廠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大罷工的光榮歷史。

工人們每從這碑旁走過，總增添了力量。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下班的汽笛剛響過，工人們拖着疲倦的身子，湧到賬房門前去領一個月的工資。當時市面上流行兩種貨幣：一種是小洋，一種是金票。物價不穩定，金票忽漲忽跌，這個月一元金票頂小洋一元二角。於是，日本鬼子想出新的花招兒，按小洋發工人的工資，按金票扣工人的飯券，經過這樣惡狠的七折八扣，工人拿到的錢就寥寥無幾了。

粗紡車間女工關雲九和杜秀貞等，一領到餉，就和開餉的日本鬼子吵起來了。那個日本職員，從窗口伸出個腦袋喊道：“米大大漲價，這月的飯費一律按金票扣！”杜秀貞氣憤地問：“米漲價為什麼不漲工錢，反而漲飯券錢？”關雲九說：“我們吃的雜合面窩窩頭、爛白菜湯，整天連點油水都見不着。你們還昧着良心，吸我們的幾個血汗錢！”工人們把

賬房的窗口圍住，齊聲喊道：“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們嗎？”那个日本職員一看不妙，“角野厂长有話，我的不管。”說完，“砰”的一聲，關死了窗口。

这时候的“福島紡織株式會社”（大連紡織廠前身）工人可不象一九二三年剛開工時那么好欺侮了。自從一九二五年春天，日本工頭高田無故打死了保全工人李吉祥，工人們成立了“大連工學會福紡分會”，大家團結起來，迫使資本家懲辦兇手撫恤死者家屬，就明白了對敵人必須堅決鬥爭，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大家先涌進了人事系。那个肉墩子似的人事系主任新井，看了看人群，奸笑着說：“現在米的大大貴，工廠錢的沒有，以後賣了紗，錢的大大給！”一个女工馬上頂上一句，“先別說以後了，我們問的是眼前怎麼辦？”工頭李伯仁見大家不走，便說：“你們還站着干什么？還不滾出去！”另一工頭張大嘴也說：“我們人事系是管招人的，少開了几个臭工錢的事，我們管不着！”新井一看人越來越多，怕鬧出亂子來，就推脫說：“我的話好使的沒有！你們統統地找大掌櫃的去！”

一看在這兒呆着沒用，杜秀貞領大家上了樓。但沒見着人。一个中國小擺台（雜役）的說：“他們都上閻屯長家打麻將去了。”大家一看，這成心是推“火輪船”，拿着工人耍笑玩，就一氣回了宿舍。坐在宿舍里，都紛紛議論開來，有人說：“連碗粥都混不上，還給他干？我算不遭这个洋罪

了。”这句话更勾起了大家的怒火，特别是女工们，进出门常常受到工头的侮辱，有孩子的女工连给孩子喂奶都不能够……所以一边吵嚷起来：“回家去！”“回家去！”一边就卷起铺盖来。

“大家不忙卷铺盖！”随着这话音，福纺工学分会会长、铁匠房铁匠侯立鉴，副会长、清棉间工人初玉昆，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大家忙围上去问：“那你說怎么办？老侯。”侯立鉴环视了一下焦急的人群說：“日本鬼子真是太欺负咱中国人了！可是，咱们卷铺盖一走，日本人就能給我們漲工錢嗎？到別的地方去，还不得照样受厂主的气？照样拿这几个錢？”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都觉得侯立鉴的話有道理。接着，侯立鉴握紧了拳头說：“我們只有象京汉铁路工人那样，抱住团和日本鬼子斗！他不給我們漲工錢，我們就不开车，給日本鬼子点顏色看看！”侯立鉴的話，給大家的心里打开了两扇窗，立时觉得亮堂了，“对，咱们和他們斗！”侯立鉴看大家劲头上来了，忙引导說：“咱停車是为了讓日本鬼子改善咱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咱们得提几个条件和厂方交涉，他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們再罢工。”

經大家共同商量，就确定了如下六个条件：

- 一、不許打罵和虐待中国工人；
- 二、要准許孩子媽媽在工間給孩子喂奶；
- 三、工錢要增加三分之一，不准漲飯費；
- 四、工作時間減少一小时；

五、公休日干活要发双倍工钱；

六、不拿电灯费，降低房租。

第二天一大早，工人们都没进车间。先在大食堂开了个会，选出工人代表侯立鉴、初玉昆和刘庆枝三人，去和日本鬼子谈判。工人们开始行动了，愤怒的人群，把鬼子厂长角野的小白楼，围了个风雨不透。角野早有准备，所有的厂警都集中到小白楼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荷枪实弹，对着工人队伍。当工人代表走进角野的办公室时，角野正坐在沙发上拼命地吸着烟。狡猾的副厂长正野，一脸奸笑地拿出三炮台香烟，递到侯立鉴他们面前：“吸支烟吧！有话好商量！”侯立鉴摆摆手说：“正野先生！我们不是来吸烟作客的，工人办事从来不拐弯抹角，你们两个大掌柜的都在，正好，这个月厂方又涨了饭费，我们工人实在没法生活了，提出几项要求，请厂方答复。”说着，把一纸六个条件递了过去。正野看看条件说：“涨饭费是厂方迫不得已呀！将来厂里发了财，决不会亏待大家。”初玉昆说：“将来工厂挣多少钱，那是以后的事，我们工人眼下总不能饿肚子干活！”角野一看，这个工人竟敢顶撞厂长，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脸上的筋肉抽动了一下，猛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从正野手中夺过工人的条件书，气势汹汹地吼道：“这些条件，统统地不能答复！”说完，把条件书扯得粉碎，扔了一地，还说：“中国苦力钱的不值！一个不干，十个有，十个不干，大大有，活的不干，统统开路！”侯立鉴冷笑一下说：“好吧，那你们



就等着看吧！”

侯立鑑一下樓，就和初玉昆等几个人交換了意見，讓刘庆枝去砸掉总电門，叫夏忠山去鍋爐房熄了火、閉了气，拉响了汽笛。这战斗的号角，三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人群，就象渤海的怒潮，向大門外涌去。角野赶来搖晃着文明棍蔑視地說：“支那苦力，三天‘米細米細’（吃飯）的沒有，統統回来干活計！”李有久晃晃拳头，走到角野面前說：“你不答应我們的条件，甯說三天，就是三个月，我們也决不來上工！”

“我們坚持罢工到底！”工人們高喊着口号，把工賬簿

雪片似的拋向了守备室的門前。工人开了会，組織了糾察队、宣傳队和救济队，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罢工，就这样开始了。

三天过去了，福紡工人們沒一个复工的。厂子里的机器都乖乖地停下来，一天天地生着锈。厂里每天上工时，照例拉笛，那嗚嗚的声音，就象鬼怪在嚎叫。应声而来的，照例的是張大嘴和李伯仁那几个人。这大大出乎角野的意料。他急得象个热鍋上的螞蟻，坐臥不安。他召集厂里大小头目开会，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罢工。他又把周家屯伪屯长、福紡顧問閻兴礼找来，要他瓦解工人的斗志。

这时候，侯立鉴也和初玉昆、李有久說：“日本鬼子一定会耍些花样，工人糾察队要好好守住各要道口，南到侯家沟，北至三道沟子，都放上崗哨，严加防范，別叫日本鬼子和工头，招进新工人来。就是遇上工贼招人，也不要和招来的工人发生冲突，要好好說服他們，說明我們罢工的真相。”

“好吧！”李有久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天，灰蒙蒙的剛剛放亮，厂子里哑巴了十来天的汽笛又响起来了。閻屯长和几个狗腿子到处嚷嚷：“哼！工学会，工学会頂个屁用！瞧，这不有些工人都复工了！复工后好吃好喝待承。”另一个狗腿子忙帮腔：“人家厂方还說了，誰复工优待誰，不复工就开除！”閻屯长又說：“这是日本皇軍的天下！还是早早复工，要不然，飯碗可就砸了！”

工人們虽然知道狗嘴里不会吐出象牙来，不信閻屯长的

話，但也有些疑惑不決：說沒人复工，怎的厂里机器响起来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个个面面相覷。这时李有久远远地跑了来：“大家不要挤在这儿，侯会长在办事处等大家，他有話跟咱們說。”人群馬上跟着李有久向罢工办事处走去。到了罢工办事处，侯立鉴把厂里开车的真相一講，大家这才明白了。

原来昨天晚上，侯立鉴回到夏忠山家，刚刚躺下，夏忠山就领着个人进来。他一看，是工学会埋伏在厂里打探消息的烧水工老傅头。侯立鉴就知道厂里有事，忙問：“老人家，出了什么事了？”老傅头說：“咳！甭提了。李伯仁这小子昨天夜里偷偷招来三十多个新工人，好吃好喝，就是不許随便出入厂！”侯立鉴連夜把这消息通知了几个工学会委員。今天，果不然日本鬼子就搞了个假复工的阴谋。

侯立鉴揭穿了这事，最后对大家說：“沒有工学会的話，無論出了什么事也不能复工！”

人群一散，李有久气得跺着脚嚷：“这还了得，李伯仁这小子真毒，我們这工就白罢了！”糾察队员陈启德揮着大棒子說：“走！找这小子算賬去！”大家商量了一陣，一致同意去教訓李伯仁。侯立鉴考虑一下，讓大家趁晌午李伯仁回家吃飯的空儿去。这个时候，正是駐厂警察睡晌觉的时候。另外，又讓初玉昆进厂去說服那些招来的新工人。

晌午，李有久、陈启德等几个工人糾察队员，便埋伏在李伯仁的門口。李伯仁家在閩家屯的西头。等了不大会儿，

李伯仁歪衔着烟卷，斜戴着黄呢子战斗帽出来了。这小子摔跤打架这些流氓手段，都有一手。陈启德凑向前去俏皮地说：“李先生！厂里还招人吗？咱也算一个！”李伯仁做贼心虚，早有防备，一看只陈启德和李有久两人，他眼皮都没抬，把嘴上的烟头往地上一吐，说：“明人不做暗事：人是我招的，怎么样？”这小子是打架出名的，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抽冷子拔出腿刀子就给陈启德一刀子，陈启德往旁边一闪，一皮带就打在了这小子的腰上，埋伏的六、七个人一拥齐上，就把这小子打躺下了。閻屯长正在家里睡午觉，听到工人糾察队和李伯仁打起来了，一边吩咐手下的狗腿子去厂里报告日本警察队，一边急急忙忙地赶来，老远的他就摇手喊开了：“快住手！快住手！”李伯仁在地下躺着，一看閻屯长来了，就象个疯狗似的，唿的一下子站了起来，照着陈启德就是一刀子，陈启德一闪，不偏不斜，这一刀正刺在閻屯长的胳膊上。这大水缸似的閻屯长“噢”的一嗓子，死劲地捂住了胳膊。这下子可大快人心，人们都满意地走散了。日本警察来了以后，扑了一场空，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罢工有一个多月了。再这样下去，工厂可受不了啦！角野急得直跺脚，因为关东州厅长官天天用电话问他。他和正野又订下第二条毒计。

这天夜里侯立鉴刚刚躺下，就听得外面咚咚的敲门声，他马上穿好衣服，就听上屋的夏老汉“喂喂”地咳嗽着出去开门了。听着老人的声音，侯立鉴的心里很不好受。前两天夏老

汉的儿子夏忠山，在东海头站岗，因为阻拦了招人的流氓，鬼子就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逮捕了他和其他几个纠察队员，夏老汉就这么一个儿子，这老人几天吃不下饭，但他仍毫无怨言地跟工学会走，这使侯立鉴很感动。

夏老汉开开门领进来两个人，他站在院当中喊：“老侯，閻屯长找你来啦！”

閻屯长一进屋就满脸奸笑地说：“侯兄为工人真是费尽心血，肝胆涂地呀！我閻某十分钦佩！”侯立鉴直截了当地说：“閻屯长今天来必有事情，是不是商谈复工条件来的？”閻屯长皮笑肉不笑地咧了咧嘴：“角野大掌柜要我和你谈谈条件。你的一切条件，大掌柜全部答应，只要你答应一条就行！”侯立鉴冷冷地问：“哪一条？”“今后不为工人办事，叫他们立刻复工。”閻屯长又进一步说：“人生在世，还不是吃喝玩乐一辈子，为那些穷苦力操心犯不着。”说着，掏出了个钱口袋来，哗啦啦地把五百块现大洋倒在了桌子上。

“只要你答应了条件，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做。到那时还不是十三响的风葫芦，抖起来了。”刚说到这里，就听“叭”的一声，侯立鉴狠劲地一拍桌子骂道：“真是狗眼看人低！甭说五百，就是五千，五万，你也买不动我姓侯的心！收拾起你这几个臭钱，给我滚！”閻兴礼板起了脸：“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往后有你后悔的时候！”閻兴礼走后，夏老汉担心地说：“看样子对你不利呀！这些家伙心狠意毒，说到就办得到。我看你还是先躲避一下子吧！”侯立鉴说：

“不要紧，老爷子。”这一夜，他却翻来复去地沒睡好。

第二天，侯立鉴回了一趟侯家沟。到了家，跟妻子说明了一个来月的处境，最后嘱咐：“我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就拉扯着孩子好好过，好在孩子的叔叔、爷爷都能帮你些忙。”妻子流了泪：“这几天狗腿子来咱家更勤了。你呀！不管那罢工的事不行嗎？”侯立鉴望望跟自己受累的妻子，和刚刚会爬的孩子說：“不！我們不能甘心过牛馬生活，再不和鬼子干，工人們就更沒法活了。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出什么事的！”說着他就翻箱倒柜，把几件值錢的东西拿出来，上当鋪当了几个錢买了几双鞋，交給了李有久。李有久問：“你这是在哪儿弄錢买的呀？”侯立鉴說，“你这就甭管了，你快把鞋发給大家吧！不能讓糾察队員光着脚到处奔走。”

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被捕了。接着，鬼子的消防队寻衅和工人糾察队員們打架，許多糾察队員也被捕了。随后，大衙門又借口封閉了工人夜校。

但是，工人沒有屈服。全国各地的声援信件、电报就象雪片似的飞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給罢工工人撥来三千元救济款同时，向日本关东州厅提出了严重抗議；总工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上，也发表了《为日本在大連摧殘华工与全日本工人及各階級被压迫者书》。

大連市各工厂的工人，从福紡罢工一开始，就在大連工学会的领导下，筹集了錢粮送給罢工的工人。現在，他們更加体会到：中国的工人階級是不可侮的，团结起来，就会胜

利！

六月二十四日，大連中華工學會決定組織一次全市工人聲援福紡工人大會。傍午，分住在各地的福紡工人一馬當先齊集到周家街。接着，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沙河口鐵道工廠（現大連機車車輛廠）的工人，小野田洋灰場（現大連水泥廠）、中村鐵工所（現大連機床廠）的工人，大連小塢（現大連造船廠）的工人等也从遙遠的市內浩浩蕩蕩地開來。大連中華工學會會長、鐵道工廠工人傅景陽走在各路隊伍前邊，后邊是十六個臂上纏着毛巾、手里提着棍棒的糾察隊員。這大隊人馬一路上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家！”“打倒賣國走狗！”

隊伍在村東的草坪上停下來，四外放上崗哨。附近的農民們，也都趕來參加。會場上黑壓壓的一片，足有七、八千人。

在會上，傅景陽講了話。這個二十七、八歲的中等身材的年輕人，亮開他那洪亮的嗓門，憤怒地說：“兄弟姐妹們，我們的福紡工人們，為了吃飽飯，被迫罷工，這本是合法的鬥爭。可是日本當局，不顧輿論反映，竟無辜逮捕我們的工人代表，封閉夜校，到處抓我們的罷工工人。我們堅決反對日本當局對罷工工人的迫害！要求他們放回我們的代表！答复工人的條件！”

“對！”大家同聲呼應着。

這時，一隊日本警察，荷槍實彈包圍了會場，用明晃晃

的刺刀紧逼着人群。但他们看看这怒目而视的人群，有些畏缩了。

一个两撇小胡的日本警官山间，带着中国巡捕红鼻子和几个日本警察走了进来。他手握洋刀柄，在傅景阳面前一站，气势汹汹地喊道：“你们什么的干？”

傅景阳义正词严地问他：“你来做什么？”

“我们保护工厂！”

“保护工厂为什么不在工厂？跑到会场来做什么？”

山间恼羞成怒，跺着脚吼道：“你们统统的反对帝国！”

傅景阳嘿嘿地笑了两声：“警官先生，你先别扯这个。我问你，为什么随便抓我们的工人？为什么封闭我们的夜校？”

这时人群已经把他们围起来了，山间一看形势不对，就摆摆手说：“衙门抓去问问没事就放，封夜校是衙门的命令！”

傅景阳质问说：“你们消防队员先打了工人，为什么不抓消防队员反抓工人？你们又在哪条法律上不许我们识字念书？随便摘掉我们夜校的牌子？”

中国巡捕红鼻子一看，工人不好惹，忙好言调停：“让皇军出去！让皇军出去！夜校的牌子马上挂起来，抓住的工人问问没事，也马上释放。”

有的工人站出来喊道：“我们不能听红鼻子这一套，他是个管眼先生，做不了主。”

“对呀！讓小胡子說！”

在工人四面威逼之下，山間只好点了头，答应馬上挂上夜校牌子。說完夾着个尾巴，带着那百十多警察，退回了工厂。傅景阳望着山間他們輕蔑地笑了笑，高声喊道：“只要我們團結起来斗到底，我們一定会胜利！”

示威游行开始了。工人雄壯的队伍，象一股怒潮，不可抵挡。一路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資木家！”“工人團結万岁！”口号响彻云霄。

关东州厅长官村上吓慌了。他把角野和正野找去，好頓訓斥。特别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抗議电，和全大連市工人的一致行动，使他覺得不答复福紡工人的条件不行了。远在日本东京的福島紡織株式会社总社长八代，也沉不住气了。电报一封跟着一封拍給角野，催促复工。七月下旬，八代匆忙地从日本赶到大連。他进厂一看，厂房里冷清清空蕩蕩的，成排的机器全都生了厚厚的锈斑，不由地跺着脚对角野怒喊道：“大日本帝国的臉，統統的叫你們丢尽了。”一怒之下，撤了角野的职，命令正野赶快处理复工事宜。于是，正野用錢买动了屯长閻兴礼，要他和工人接头，进行談判，答复了工人們提出的六項条件，并釋放工人代表。于是，八月三日那天，工学会向全体罢工工人发出通知：罢工胜利，明日复工。

第二天，罢工整整一百天的早晨，金晃晃的太阳从东海上露出笑脸，笑得周家街格外有生气。工人們陸續来到周家

街，农民們也站在自家門口，向工人們拱手庆賀。工人們越来越多，成群結队，高呼着“罢工胜利万岁！”昂首闊步地走进了工厂。

(于明厚 插图)

孙家的儿子

朱 贇 平

一九三〇年的严冬。山东省济宁县的兴隆街。在闊人飲酒作乐的閣楼下，在叫买叫卖的紅綠幌門前，在滿布車轍印痕的雪路上，不时出現一个三十多岁的姓孙的女人。她蓬头垢面，衣着襤褸，殘廢了的身子背着一个两岁的儿子。她忍受着全身的痛苦，在风雪中，臀部着地，往前磨蹭地爬行着。

在十三年以前，她嫁了一个穷汉子，在她生大女儿的时候，連个托身之所都沒有，沒有家，沒有茅草棚子，連个躲避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得了月子病，害得下肢麻木瘫痪了。从此，她两手撑着一双小木凳，穿大街过小巷，越过坡壟田坎，沿路拖着身子，上各地討要。

这条街上的人，十几年来，几乎每一天都会看見这个女人，撑着一双小木凳，背着孩子，在地上拖着畸形的下身，睁着风吹流泪的眼睛，从这条街到那条街，艰难地爬行着。那套在她脖子上的要飯筐，一直是在胸前晃蕩着。她經常被人侮辱、被人驅逐。有时正爬行在路上，突然遇到警

察，她就不得不强迫自己象好人一样地飞快地躲过去，不然就会遭到毒打。她在人群中，象鬼一样地过活。她不認識誰，也不知道人世間有什么溫暖。她所以这样頑強地生活下去，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能幸福地长大。可是，任凭她如何掙扎，她却沒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儿女，她的前两个骨瘦嶙嶙的孩子已經活活被餓死。孩子临断气的时候，用小手拍着肚子，向她輕微地喊着：“娘，俺餓呀！”她不哭也不喊，睜着一双枯干的眼睛，忍受着母子死别的痛苦。

现在，她又背上了最小的儿子——連成，在生活的路上，繼續掙扎。她希望着，幻想着，現在背在自己背上的儿子，虽然下生以来，一口奶也沒吃着，两只眼睛餓藍了，瘦得皮包骨头，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这个唯一的儿子再餓死了。

这天晚上，她背着两岁的連成，走遍了各处，也沒要着一口湯水和一个銅板。因为这正是灾荒的年头，粮食都囤积在财主家了。她靠着路灯的杆子坐下来，喘了口气，又机械地喊起来：

“帮帮吧！俺是个殘廢人……”

在这个时候，有个四十来岁的壮汉子，来到她的面前，望着她那血肉模糊的两手，痛苦地說：“快家去吧！”

这个壮汉子，就是她的男人。一个有血气的男人，怎么能够忍心，讓自己的女人在外边叫街呢？可是为了儿子的一口奶水，他不得不讓女人这样去做啊！因为他起早貪黑做

工，也掙不來錢。說大話，怎么能騙了女人？窮就是窮。

壯漢子兩眼含着熱淚，把癱瘓的女人背回家來。

這不是家。這是人們常見的一座破敗的尼姑庵。院中的庵堂，又陰暗又潮濕，高牆四壁，掛滿了白霜。一扇板門，用來遮掩風口。孫家就住在这里。

男人一進屋，總是蹲在地上，兩手抱頭，咳聲嘆氣的。女人也是不聲不響的，把兩歲的連成抱在懷里，望着孩子那副凍紫了的臉蛋，和餓癟了的肚子，慢慢地流下淚來。可是兩歲的連成，知道什麼？他只是睜着一雙小眼睛，無憂無慮地望着，餓了知道哭，樂了知道笑，然而他並不知道他的父母，為了他，竟遭受這樣的折磨。

一天傍晚，連成的父親從外邊做工回來，剛剛跨過門檻，就聽到連成哇哇的哭聲。他一步邁進屋來，眼前的情景使他驚駭了！

那從前跟他過活的年輕的妻子，受盡了一切非人的折磨的妻子，在淒風苦雨、冰雪路上爬行了十多年的妻子，此刻安靜地躺在一堆亂草上。她毫無怨言、毫無怒色，終於凍餓死在兒子的面前。兒子正趴在她的身上，一面死勁地叨着她的奶頭，一面大聲地哭叫着。

母親的死，給兩歲的連成，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庵中的尼姑，攆他父親搬家了：“你們住不得啦！這不同你女人活着的時候。如今庵中留個男人，讓外界議論，可不好啊。”沒錢住店，沒親投宿，往哪里去？父親總覺得應當把兩歲的

連成撫養大，也好對得起死去的妻子。於是，將十二歲的大女兒送給人家做童養媳，換了幾十塊錢，拿給尼姑，哀求道：

“我老人把我生在尼姑庵里，我這個兒子，也是生在這個尼姑庵里！眼下他娘死了，孩子又這麼小，讓我怎麼能帶活？你們行行好，幫我帶帶兒子……”

尼姑看着沒有娘的兩歲孩子，心有點軟了，一邊接錢，一邊說：“把孩子先留在庵中吧！死活可不能全保啊！”

當尼姑從父親手中，把孩子接過去的時候，在父親的心頭上，產生一陣劇烈的疼痛。剛剛兩歲的嬰兒，已經在寒風雪路上，跟母親一道乞討過；現在又被留在尼姑庵里……，世道真是殘酷啊！父親就帶着這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尼姑庵，到外地做苦工去了。

干瘦的兒子，在尼姑庵里，得不到什麼營養，只會哭，兩隻小眼睛哭的總是紅紅的，眼邊都爛了。尼姑怕外人聽到孩子的哭聲，常常用棉花團把孩子的小嘴塞住，口里又念着“阿彌陀佛”，象是為孩子“祝福”。

連成在尼姑庵活到四歲的時候，外人傳說他是尼姑的私生子，尼姑聽這話，說什麼也不帶了。父親只好把連成從尼姑庵接出來。被兒子拖累，他只能一處一處地白給地主、老板干活，好給連成帶口吃的。連成八歲，就在濟寧南關一家燒鍋當童工。因為童工過多，孩子在一起干活，免不了打打鬧鬧。老板看見，就叫孩子們手扶牆，屁股朝外，用木板叭叭地打孩子屁股，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再不，就用帶刺的笞帚

把打脑袋，連成脑袋被打得直冒血津，痛得两眼冒花。几年后，連成的父亲，劳累过度，一时干不了活，被一家酒厂解雇了。这正是一九四〇年旧历一月。父亲领着赤脚打掌的儿子，又来到这条风雪横扫的兴隆街。这条街，依然是从前的那个样：在闊人飲酒作乐的閣楼下，在叫买叫卖的紅綠幌門前，在布滿車轍印痕的雪路上，正有无数所謂被命运撥弄的穷人，在叫街、奔走、啼哭。可是不同的是，在这条街上，或在那夜晚的路灯下，再也看不见那个两手扶地的瘫痪的女人；而当初，曾在她背上背着儿子連成，如今已經十二岁了；在他的嘴角上和眼角上，还保留着他母亲往日里一点忧郁的神态。父亲望着长大了的儿子，象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呆呆地站在父亲的跟前，冻得面目緋紅。父亲心痛地想：“儿子还小啊！怎么也不能叫他也走上这条要飯的絕路！”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有一个陌生人，把父子二人釘住了。陌生人笑嘻嘻地塞給連成两块鯨鯨，于是向連成的父亲說：“老哥！象你这山东大汉，何必遭这个难？走！我介紹你到关东干活，那里吃得好，住得好。”

父子二人跟陌生人走进一家客棧，馬上就被持枪的卫兵看住了。这时他們才发现被騙当了劳工。

旧历一月末，父子随着从济宁抓来的三百六十多名劳工，来到安东五龙背山区。放眼一望，到处是冰雪。父亲看看自己的儿子，还光着两只脚，在雪窩子里踩来踩去；脚冻

烂了，脚背都露出了骨头，疼得孩子直咬牙呀！父亲一抬手，将自己棉袄上的两个袖筒撕下来，给儿子绑在脚上；自己袒露着枯瘦的两只胳膊，在风雪中钻来钻去。

虽然连成年岁小、个头矮，但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也得照样上山，刨冻土，运石头。土冻石头硬，镐尖一落，一个白点，把连成的“虎口”都震裂了，流出血水。夜晚就睡在半山腰的席棚子里。吃的是苦涩的橡子面，连点盐水都没有，硬噎。由于连成一小营养不良，又加上整天吃橡子面，火性大，孩子半夜直发烧，烧的两只眼睛干疼。

在一天太阳落山、百鸟归巢的时候，连成睁着眼睛，竟看不见路了，急得孩子直喊：“爹，我眼睛怎么的啦？”父亲望着儿子在山路上，扎煞着两只手，象没脚跟似的，趑趄趑趄地往前走，一会跌倒，一会爬起来，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赶上前拉着儿子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路，也没说一句话。父亲使出最大的努力，镇定了自己的情绪，但是眼泪还是流出来了，润湿了他的脸。他望着儿子，这孩子还在不懂事的时候，就整天整夜地跟着父母遭难，吃不饱，穿不暖，风打他的两眼，泪水泡他的两眼，饥饿折磨他的两眼，以致使他的两眼，早已消失了孩子们常有的光亮和锐利的神采，变得枯干了。面对这眼前崎岖不平的路，做父亲的，怎么忍心看着自己年幼的儿子，也和他母亲一样，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被人侮辱、被人驱逐？这时父亲的脸色，严肃而又苍白，他问了儿子一句：

“連成，眼前那块石头，能看見嗎？”

儿子睜大两眼，赶忙向四处張望了一下，說：

“爹，啥也看不見啦！”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晨，連成却欢快地扑到父亲的怀里，說：“爹，我眼睛好了！”

父亲这时才知道儿子由于极端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这，給父亲提出了一个警告：不能再这样忍受啦！他不顧死活地去找鬼子、把头：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不能眼睜睜地看他瞎了眼睛！給点粮、給点盐水吧！”鬼子、把头沒給，竟說父亲带头鬧事。父亲整天想着儿子的眼睛，心里有事，做活也无精打采，有一天竟把“粘轆馬”挂倒了，遭到了鬼子們的毒打。

父亲被弟兄們抬回席棚的当夜，已經昏迷不醒了。两条腿被打断了，血肉模糊地当郎下来，仅有一层紅腫的皮肉連着。天傍亮，父亲苏醒过来，几次想跟儿子說句什么，可是嘴唇直动，却說不出話来。不久，也和母亲一样，默默无声地死去，抛下了孙家一个十二岁的孤儿連成。

連成站在山崖上，望着尸骨迭迭的山沟。現在，他无父、无母、无錢，再沒有一个亲人来疼爱他，再沒有一象从前死去母亲那样，有人把他送进尼姑庵里，即便有寒风冷雪的吹打，也还能活着。眼下，却需要他自己，孤独地走路了。

父亲死后不久，旧历五月，連成又随着大批苦难的劳

工，轉移到黑河修鐵路。他們干到八、九月份，黑河就結冰落雪了。在這一馬平川的地帶，連成沒鋪沒蓋，只是在洋灰袋子里絮點雜草，作為被褥。吃的是辣滋滋的凍得象個鐵蛋子似的紫皮土豆，咬也咬不動，只好攔在腋窩里暖，化一層，啃一層，沒等啃完，又鳴笛上工了。

由於天寒地凍，實在無法施工，鬼子又從黑河，把這批勞工，象貨物一樣，轉賣給奉天公泰莫紡織廠做工。

連成來到這家紡織廠，因為自己的眼力不佳，弄斷了綫頭，常常挨打。直到一九四一年舊曆二月，連成和一批勞工，在一天夜里，從紡織廠逃出來，開始走上父親從前走過的那條道路：黑天白日賣零工。最後，又落腳到奉天國際腳行干苦力，直干到一九四五年“九三”勝利的時候。

就在這年年底，連成的眼病越來越重了，總象蒙上一層雲翳，看什麼都晃忽忽地看不清。有經驗的老工人，知道這是一個險兆，就向連成說：“孩子，你年紀輕輕的，可不要把眼睛耽誤啦！捎封信，跟你爹媽要幾個錢治治吧！這是一輩子事。”連成鼻尖一酸，兩眼一紅，沒有回話。老工人又說：“孩子，捎個信吧！你爹媽再難，也比你個孩子強，怎麼的也能挪動幾個錢……”連成忍受不住了，突然哭着說：

“爹娘早死啦！”老工人聽着這話，眼圈不由也紅了，默默無言地望着這個孫家的兒子，他得怎麼辦啊！

連成不是不想治啊。他幾次上街，望着“眼科大夫”的牌子，呆呆出神，可是兜里無錢，進不去呀。視神經痛，折

磨他整夜睡不好覺，那眼珠漸漸往外鼓起來，發紅發白了；瞳孔有點放大，以至於不能上工了。工頭找上門來，大罵道：“快他媽上工，閑飯沒你吃的！”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怎么能抵擋住有权有勢的工頭啊！連成只好上工，扛着沉重的貨物，眼睛痛，硬挺着。夜里回到工棚，就一個勁地哭。

老工人們知道孩子的娘，死在尼姑庵里，孩子的爹，死在五龍背，個個都洒着同情的泪水，安慰他：“孩子啊，可別哭啦！可憐可憐你那雙眼睛吧！”

在春雷鳴响的一九四六年春三月，孫家的兒子——十八歲的連成，由於舊社會殘酷的折磨，突然在一個早晨，兩眼終於失明了！他精神錯亂地揮舞着兩手，在工棚里狂怒地喊叫着：

“爹！我的眼睛啊，怎么啥也看不見啦！”

喊聲，使人想起來了孩子在五龍背得夜盲症的時候，也是這樣喊着爹的，不過，那時孩子的兩眼，很快地好了。眼下，他是完全失明，世界呈現給他的，是一片无情的漆黑，望不見陽光、五色。

父親母親，為了保護一個兒子，曾遭受百般的磨難，以至終身殘廢；而眼下離開父母的兒子，也竟然跟他父母一樣地殘廢了！

老工人看到此情此景，心都碎了，向連成說：“孩子，你別難過啊。咱們會把飯喂到你嘴里去的。”

孩子的喊叫声，把工头招引来了，他望了望双目失明的連成，罵道：“殘廢啦，快滾蛋吧，別在这里出洋相。”說着，把連成的破烂衣袄，統統地扔到門外。孩子一早，还没有穿上衣服，几乎是光着身子，在板鋪上站着；因为他瞎了眼，自己摸不到穿戴了。老工人从門外把衣袄撿回来，帮着孩子穿在身上，然后向工头說：“孩子眼睛坏了，你們讓他上哪去？”工头一怒：“你他媽給他穿戴好了，怎么就不知道讓他上哪去？这里不是养大爷的地方，該叫街，該要飯，自己找条路！”大伙好說歹說，工头才允許連成再住一宿。

这天夜里，連成却反常地平靜下来，簡直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安安稳稳地躺在板鋪上。然而他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着。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他們都免不了一死，可自己眼睛瞎了，还能活下去嗎？半夜里，他一个人摸进了廁所，剛要上吊，被一个老工人救了下来，向他說：“不能死啊！你死了也对不住你死去的爹娘啊！”

工头在名册上，把連成除了名，从此断了他的飯碗。没有办法，連成只好上街乞討。在連成第一天上街乞討之前，工人弟兄，特意找来一張硬紙壳，求人写了一段令人酸鼻的文字：

此人双目失明，困境难当。母餓死山东，父
惨死鬼子鎗下，眼下住店无錢，无亲无靠，
为解燃眉之急，望行路君子，慷慨資助。

貼在連成的胸前。弟兄們又牢牢地囑咐他，“小心車輛。晚

上回来住。”

孩子，沒有适应这官人的生活，他順着牆身，試探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摸，不知什么絆了他一下，又不知什么碰了他一下；跌倒了爬起来，疼了忍耐着，終于摸上一条大街。虽然他两眼看不见什么，但一听到路两旁叫买叫卖的声音，听到飲酒作乐的狂笑声，听到“爷爷、奶奶”的哀叫声，他也許会觉得这条街，对他并不陌生吧，简直就象他母亲背他乞討过的那条兴隆街。

他不知道自己又走到了什么地方，突然被人圍起来，吵吵嚷嚷地念着他身前的那几行字，有的发出了叹息声，有的发出了嘻笑的怪声。不論是怜悯他，还是嘲弄他，他都觉得难堪、气悶。他想冲出人群，跑回工房，哪管餓死冻死，也比叫街强多了。可是他走过的路，再摸不回去了，象个被枪声惊吓的小鳥，开始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闖起来。

不知闖到什么时候，路上断了行人，听不見脚步声，听不見飲酒作乐的狂笑声……，好象整个世界，都平靜下来。这时他感觉身上冷了，肚子餓了，于是爬上了一个台阶，叫喊起来：“帮帮吧，我是个殘廢的孤儿！”沒有人答应，沒有人向他身前靠攏。只他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灯下，向那万恶的旧社会发出强烈的控訴。这跟十几年前山东济宁的那条兴隆街上的情景有多么相似，可那个殘廢的女人，在路灯下叫街之后，終归还有个男子汉，来喊她把她背回家去。但眼下有誰来喊这个孤儿？有誰給他带路？又不知什么时候，他听

到店鋪的門板响了，車輛动了，喊声出現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經在十字街口冻餓了一夜。

孙家的儿子，就这样在街头乞討、流浪，一直到沈阳解放。

两耳閉塞、两眼漆黑的連成，他哪里知道解放不解放？特别是这座剛剛从敌人手中接管过来的城市，仍然处于紊乱之中。人民政府对于貧困居民的收容，才刚开始。正当連成在馬路上和泥土、风雨打交道，弄得衣不遮体，头发老长，面目不象个人样的时候，沈阳鉄西区人民政府民政科的同志，从大量的貧苦居民的名簿中，发现了孙連成的名字，并且派人在街上把他找到了，对他說：“你是孙連成嗎？跟我去吧！”虽然說話的語气，是那样和藹可亲，可連成听来，不由有点发毛了；想起从前也有这么一回，自己因为要飯走錯了門，摸进了国民党的兵營，叫人关了起来。今天，又是怎么回事？他被領进了一个地方，民政科的同志，亲自給他洗了澡，理了发，并給他送来了衬衣、棉衣和粮食。整整一夜，連成躺在有鋪有盖的床上，覺得溫暖极了，想呀想呀，越想越觉得这是一场梦；这怎么可能呢？叫街的花子，有誰能瞧得起呀！然而民政科的同志，却及时地总结了他的苦难历史，通宵向他講解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

連成一点点地懂得了，懂得了自己的过去，也懂得了自己的未来。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的时候，連成带动鉄西区的

盲人，将自己挣来的钱，捐献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打击美帝国主义。

一九五二年，政府帮着双目失明的孙家儿子成婚了。在婚礼上，连成虽然看不见政府为他购买的各种家具，但是他已经摸到了，想必都是大漆的，若不为什么都那样溜光水滑？他激动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婚后，粮站主动往他家送粮，服务站主动给他送菜。就在这一年，连成接到了政府的通知，请他到沈阳小河沿医大，给他治眼睛。

在童年时期，一直过着流浪生活的连成，他当夜躺在病床上，耳边所听到的，是护理人员柔和、关切的声音：“连成同志，你渴吗？”“你寂寞不？让我来给你讲一段故事好吗？”一个从前被人遗弃的孤儿，今天得到了这样的温暖和幸福，你想，他的心情会是如何？整整一夜，他没有睡觉，想起了瘫痪的母亲，她是多么疼爱儿子，可是却无力抚养儿子。他想起了瘫痪的父亲，是多么疼爱儿子，却也无力抚养儿子。今天，唯有党和政府，把孙家的儿子，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想到这些，内心熾烈的激情，涌动不止。他想马上睁开眼睛，看看这崭新的世界，看看这周围亲如父母的同志！然而，由于连成两眼失明过久，经过大夫百般的医治，才使他的右眼能看到光和色。正在他兴奋之中，护理人员从床位上把他扶起来，让他望望早晨的曙光。他睁大两眼，贪婪地望着映有光泽的玻璃窗，望着五色，望着这缤纷绚烂的新世界，好象看到了自己的黎明，看到了自己的新生；同时，似



乎也看到了在世界的另一面，仍有无数奴隶和黑人的儿子，正在被殘暴的帝国主义統治者侮辱、驅逐和迫害。他再不把这看成是一场梦，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现实，现实当中两个不同的世界啊！

政府为了扶植盲人自力更生，在南市区成立了盲人技术养成所（沈阳盲人教学工厂前身），将連成介绍到该所学手

艺，使他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年以后，連成的妻子要临产了。連成又高兴，又担心。因为自己的妻子也失明，孩子的小衣服由誰来做？又由誰来照顧他的妻子？可是在他一天下班回来，发现屋門鎖上了，一問，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早被邻居送进了产院。他赶到产院，剛剛坐上产房通廊的靠椅，便听到了嬰兒的哭声。他的心不由一动。当护士前来祝賀他得了个白胖胖的儿子的時候，他突然在惊喜中，慢慢地沉默起来，他两只眼角上，流出几滴热泪。他想起来了，母亲在生姐姐的时候，由于无家无舍，产后作下病瘫痪了，而自己又生在风寒四起的尼姑庵里；如今自己的妻子，却安静地躺在产院里，自己的儿子，正被医务人员万分小心地保护着，喂奶，洗澡。这也是孙家的儿子，却生长在幸福的国家里。連成也当了父亲，可怎么能同他苦难的父亲相比？他的父亲，为了儿子，四处奔波，找人带他，竟找了一位“慈善”的尼姑；可眼下他的儿子，却由政府花钱，給他請一位临时的保姆伺候着，照顧他那双目失明的妻子。两代的孙家，两代的儿子，又是多么不同啊！更令人喜悦的是，那三十年前，被父亲卖给外乡当童养媳的大姐，解放后，经过济宁市人民委员会的帮助，竟在沈阳与自己的弟弟团聚了。姐俩悲喜交加，热泪横流地傾訴着以往，喜庆今天。

这个从前受过苦难的孙家的儿子——連成，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沈阳盲人教学工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站在庄严的党旗面前，望到了火紅的新世界，望到了

光亮和五色，望到了他应该望到的一切！他的两眼，好象完全明亮了……。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写于沈阳

(唐秋云 插图)

当我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时

铁岭橡胶厂女工张淑华 口述

铁岭橡胶厂三史编写小组 整理

逼 债

我出生在河北省迁西县崔家堡一个贫农家庭里。

一九三四年，我们那里连下四十多天大雨，我们租地主“狠毒虫”的一天地里的庄稼，全被山上下来的大水冲走了。

那时候我们家十口人，太爷、爷爷、奶奶、爹妈，还有我们姐弟五个人。怎么办哪？不仅全家人生活无着，而且每年欠下“狠毒虫”的债，再加上今年这六斗租子，拿什么还呢？到了冬天，“狠毒虫”就三天两头来我们家讨债，非要我们头年把债还清不可，“狠毒虫”说：如果头年不还清，腊月三十来撵我们搬家，房子就归他啦！

怎么办？全家人苦思苦想，也没有想出点办法来。最后不得不把我聘给了离家十八里地的里不峪贫农郭永福的儿子郭振华。双方老人核计妥了以后，那天我爹去过彩礼，拿回

来四十元錢。后来我才知道，郭家这四十元錢，也是費了很大勁东拼西湊才湊够的。当爹爹过彩礼回来时，一进屋，就把錢递給媽。媽一边哭一边說：“咳！都是咱穷啊，要不，孩子才十岁，哪能給人家。”然后又把錢递給爹，“去吧，把錢給財主送去吧。够不？”“誰知道啦，碰碰看吧！”說完，爹拿錢出去了。那年月，穷人欠富人的債是沒数的，本加利、利滾利，今年滾明年，旧債加新債，一个大字不識的穷人，怎能算清这笔賬呢？

爹从“狠毒虫”家回来，低着头，連屋也沒进，就直奔猪圈去了。“把錢送去啦？”媽湊到爹跟前低声問。爹沒有吱声。“还够了沒有？”爹憤恨地說：“够？还要这头老母猪！”听說还要老母猪，我們都急了，媽急得臉都青了。这老母猪是姥姥送給我們的，姥姥对我媽說：“这个小母猪崽給你們吧，好好养着它，留着将来下崽，好接济接济你們家里的生活。”从送来猪崽那天起，全家人就象伺候小嬌孩一样飼养它。当我们每次跟媽說肚子餓时，媽总是递給我們大筐說：“去吧，孩子，去弄点野菜来，好喂猪，等猪大了下崽卖錢，媽給你們买米做好飯吃，叫你們吃个飽。”多不容易呀！全家人起早食黑，忍飢挨餓，把猪养大了，眼看就要下崽了。可是，狠心的地主竟想要它！媽象瘋了一样說：“我去跟他說說去！”还没等媽轉身，就听“狠毒虫”說：“不用去，我来啦！”“狠毒虫”帶着两个狗腿子，象凶神似的走到我們跟前，眯縫着两只狗眼睛，睨睨我們全家人，

嘿嘿冷笑了两声說：“想怎么的？姓張的，想要賴嗎？那可办不到！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有一个敢欠我錢不給的哪。”他回头冲两个狗腿子說：“把猪給我套上拉走！”听說拉猪，媽奔到“狠毒虫”跟前說：“我們老小就指着这口猪哪，你拉走，我們全家可怎么活呀！”“狠毒虫”把狗眼一瞪，說：“臭娘們，誰管你怎么活，去！”說着，当的一脚，把媽踢了个跟头。由于飢餓劳累，媽身体本来很虛弱，加上今天連气带急，被“狠毒虫”踢倒以后便昏过去了。我們大伙七手八脚把媽抬进屋里，媽口吐白沫抽起瘋来，从此媽就落下这个毛病，每次着急、生气就犯抽瘋病。

飢 餓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們家生活就更困难了，“狠毒虫”不再租給我們地了，爹只好去給他扛活，媽也昼夜不停地給他織布。每天，我領着十岁的大弟弟出去挖野菜，攬树叶。有一天，我和弟弟在东山坡一棵楊树上攬树叶，“狠毒虫”忽然从山那边奔我們来啦，他边走边喊：“小兔崽子，禍害我的树来啦！”我在树下見势不好，忙喊：“弟弟，快点下来！”弟弟因为着急，一失脚，便从树上掉下来，摔得鼻口淌血。“狠毒虫”赶到，举起文明棍，照准弟弟便打。我忙上去拉弟弟，也挨了两下子。由于这次挨摔挨打，弟弟病了好几天，沒有出去挖菜。

“狠毒虫”家养了好几条看家狗。有一天，我和弟弟看

見狗正在食槽里吃挺白的高粱米飯。我們家過年也沒吃過這樣飯！我跟弟弟年齡小，不懂事，看見這飯，肚子就咕嚕咕嚕地響起來。我們看了一會，那些狗吃飽走開了，食槽里還剩下一些飯。也是飢餓把人逼的呀，弟弟瞅瞅我，又看四處沒人，便飛似地跑到狗食槽跟前，把剩飯收到一起，用衣襟兜起便跑。我們倆偷偷用水把飯濾了幾回，吃了一個小飽。以後，我們又照樣弄了幾回，可是我們沒敢對媽講。因為我們知道：媽是不會同意我們這樣做的。但是媽到底知道了。她把我們叫到跟前說：“孩子，人窮志不窮，吃狗食讓人家笑話。再說，劉家是狼窩，你們要是惹出什麼事來，叫媽可咋辦？以後千萬別再去啦！”弟弟低著頭不吱聲，我忙答應說：“媽，你放心，以後我們不去啦。”

可是，弟弟太小，不久他又去了。那天下午，他不在家，我怕他再去弄狗食，便出外尋找，剛出大門不遠，便看弟弟用手捂着臉，邊哭邊從劉家跑出來。原來弟弟被“狠毒蟲”的六兒子打了，打得順嘴淌血。我領弟弟到河邊洗去了血跡。因為怕媽媽知道心痛，我沒把這事告訴她，我勸弟弟今後不要再去啦。舊社會就是這樣殘酷啊。

媽不管黑夜白天，拚命地給“狠毒蟲”織布，掙幾個錢還捨不得買米。有一次買了點糠，可是萬沒想到，糠里摻了松木鋸末子，沒法吃。碰巧我們鄰居劉景懷家娶媳婦，我們給他拆洗枕頭的時候，用糠把枕頭里的谷皮子換出來，用鍋炒了一下，然後用碾子壓成面，摻野菜吃。咳！那玩藝多難

吃啊！一股腦油味，現在想起來還噁心。可是飢餓逼得我們不吃不行啊！媽那時候是最苦的了。別人可以弄個半飽，可媽媽連半飽也撈不着。飢餓和勞累，把她折磨得眼窩凹下老深，胳膊腿精細。當她在織布機上餓得不行的時候，便咬上幾口咸菜，喝幾口水。爹看媽太苦，經常勸媽注意身體。可是每次媽都說：“你不看看孩子們都啥樣了？上有老，下有小，我還怕餓！”是呀，那時候我們姐弟幾個，一個個瘦得胳膊象麻秆一樣。

有一次，奶奶和媽媽給村里一個商人砸杏核，我和大弟弟幫着挑杏仁，餓得太厲害吃了幾個。不料這苦杏仁有毒，吃了之後，便覺得頭昏噁心，接着便口吐白沫人事不省了。媽一見我們這樣，哭得死去活來。還是奶奶出主意，媽含着眼淚要來幾棵白菜，剝碎後，用包袱皮擠出水來灌我們。第二天早晨我才蘇醒過來，可媽的眼已經哭紅了。飢餓，在舊社會就是窮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哪，壓得人們喘不上氣來。

死 亡

一九四一年春天，九歲的二弟得了流行病，大口吐血。媽整天整夜在織布機前忙碌，顧不得照看，二弟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到第三天，更惡化了。那天中午，二弟用他那微弱的聲音，不斷地叫着：“媽，你來！我心咋這麼難受呢！媽，我想喝點飯米湯。”二弟的要求并不高，僅僅要點飯米湯。可是那年月咱窮孩子連這點要求都得不到滿足。為了全

家人的生活，媽不能离开織布机。我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吃上米飯了，哪来的米湯？

二弟叫得太可怜，听了都揪心。媽走下織布机，摸了一下二弟發燒的头說：“等着，儿子，媽給你耍碗米湯去。”过了一会，媽从隔壁刘滿家要来一碗米湯。二弟接过碗剛要喝，忽然觉得嗓子发痒，他放下碗，媽扶着他到炕沿去吐血。当二弟吐完血回来想再喝米湯时，碗已經空了。原来是大弟弟从外边进来，見有米湯便喝了。媽气得把大弟弟打了一頓，又去織布。二弟見媽生气，沒有再耍米湯，只是不断地哭泣着叫媽：“媽，媽，誰你来！媽你到我跟前坐一会，我不要米湯啦！”声音是那样可怜，使人听了难过得了不得。奶奶对媽說：“孩子病得这样，你咋还不看看他呢！”“我老守着他，咱們吃啥呀？”“我不吃，你看看孩子！”見奶奶生气了，媽这才含着眼泪走下織布机，坐到二弟身旁，摸摸二弟的头，又擦去二弟嘴边的血。二弟用手摟着媽媽的腿說：“媽，我心……难受！”媽說：“你放开媽，媽去給你借碗小米来，給你熬粥喝。”“嗯！”二弟放开媽，媽拿着碗出去了。

可是，万沒想到，媽借米回来，就再也听不到二弟叫她一声“媽”了！媽媽走后，二弟又吐了一大口血，接着便昏了过去，不一会儿，就断气了。媽借米回来，抱着二弟的尸首大哭，九岁的二弟便这样死去了。

就在这一年，太爷、爷爷、奶奶都先后死于飢餓的熬

煎。他們劳动了一輩子，死后連口棺材都沒撈着。

出 嫁

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郭振华，在金場峪一个日本人开的金矿里当工人，因为忍受不了鬼子的殘暴統治和压迫而逃走，参加了八路军。

那时候，我們那里是游击区，地下党組織和地下政权建立起来了，人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斗争。

一九四一年，我十七岁了，两家老人商量，决定这年冬給我們办喜事。当时，我們家穷得一无所有，任啥也陪送不起。后来孀子大娘們說：咱家里穷，陪送不了啥，可是，孩子过門，女婿又不在家；女婿在家，扯女婿被边，女婿不在家，扯誰的被边呢？大伙湊着給做床被吧。这样，孀子大娘們湊着給做了一床被，这就是我唯一的嫁妆。

在我們結婚前两天，老郭請了几天假回家来了。但这事被汉奸知道，报告了鬼子。

結婚那天晚上，我們还没有睡，老郭的一个表弟跑来送信，說鬼子要抓老郭。老郭当时就回了部队，我們全家也都跑上了山。鬼子扑了个空，便把我家砸得稀烂，連鍋碗瓢盆都打碎了，我的唯一的嫁妆——那床新被也被搶走了。我的新婚之夜就是这样度过的。

以后，鬼子又来抓了几次，但都跟头一次一样扑了空。

一九四二年，敌人經常来“扫蕩”。不幸的事到底发生

了。这一年春天的一天，鬼子又来“扫荡”。照例，我们都先跑上了山。当公爹和一个姓伊的邻居刚跑上西山时，鬼子也从西山那面上来了，公爹急忙往回跑，可是东南北三面，已经都是敌人。公爹和姓伊的邻居被捕了。

敌人真狠哪，他们用绿豆条穿着他们的锁骨，把他俩拉走。到金场峪后又用大钉子把他们的手钉在汽车箱板上，拉到兰县去了。

这次鬼子不仅抓去了公爹，还放火烧了房子，全村人都遭受了很大的灾难。

后来，在内线同志的情报里，我们知道：公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残忍的敌人，把公爹拉到兰县黄土山，用洋狗把他活活咬死了。

敌人越是残忍，群众的仇恨越是深，愤怒越大。

生 儿

公爹被害以后，婆婆终日啼哭。残废的叔公，年幼的小叔，加上我这个年轻的媳妇，陪伴着婆母。由于对亲人的怀念，对敌人的仇恨，以及生活的压力，婆母终于忧虑成疾，双目失明了。

那时我们住在被鬼子烧毁的房子的废墟上。开初，我们还用木棍支一支，转圈和顶上弄些谷草围上。因为鬼子经常来“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我们干脆连支也不支了，

只是用松树枝搭一搭，人便“猫”在里边躲避风雪。

至于吃的，那就更难了。婆母瞎了，叔公是殘廢人，小叔那时才十一、二岁。我还清楚記得我第一次出門要飯时的情景：我們全家已經好几天沒有吃东西了，体弱的婆婆餓得都挑不起眼皮了，眼看就要餓死，我心象刀扎似的难受。怎么办哪？想来想去，我决定出去要飯。

提起要飯，真是难哪。一个十九岁的年輕妇女出去要飯，怎么張得开口呢？有心不去吧，又不能眼看婆婆餓死，死逼无奈和小叔出去要飯了。边要飯，边吃野菜，我們几口人对付活着。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接到老郭托人捎来的信，說他出发路过我媽家，我便赶了十八里地，到娘家去看他。那时候，他給一个首长当警卫員。沒見面的时候，心里好象有很多話要对他說，可是一見面，啥也說不出来啦。我哭了一会才跟他說：“爹被敌人害死啦，媽眼睛也瞎了。”他对我說：“不要难过，應該把仇恨記在心里，我們总有报仇那一天。”这一次，我們沒有說多少話，队伍就出发了。

不久，我們又在我娘家見了一次面。这一次我要跟他去。他劝我說：“你离开家，媽怎么办呢？暂时克服一下困难，苦日子不会长了。”

这一年，我有时要飯，有时給人家縫縫补补，对付着养活家里人。

这年春天，敌人又来“扫蕩”，我們跑到南边一个叫

楊樹溝的屯子里。恰巧老郭他們的隊伍也在那里。我們結婚二年多，這一回才住在一起。那個時候早晚兩頭还挺冷，他見我只穿了一條單褲，便把他的一條褲子給了我，又囑咐我好好照着媽。

不久，我懷孕了。那時我正給富農老高家當雇工。他們家的活計，從挑水做飯到推碾拉磨，拆洗縫做，全都由我包下來。每天，早起晚睡，拖着個雙身板給他們干活。那年七、八月間，有一天中午，他們叫我取一雙鞋，鞋在一個大缸里放着，我個小够不着，就腳尖點地往上一躡，臥在缸沿上，伸手到缸底去够鞋。由於這次够鞋，我抻着了。當天晚上肚子痛，開始流血。第二天早晨，高家叫我推高粱米，碾子離高家二里多地，我扛着幾十斤高粱，到碾道推了不幾圈，肚子就疼得一陣比一陣厲害，頭上的汗珠象豆粒似的往下滾。我抱着碾杆，咬着牙推。一陣劇烈疼痛以後，我流產了，昏了過去。一個小生命也就這樣斷送了。

我被一位鄉親發現，找人抬回家，躺了幾天。剛能支起身子便又去做活。高家不用我了，我就攬活計拿回家做。無論怎樣艱難，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我得挑到底啊！

這年秋後，我們躲鬼子又到西溝屯子，在那我又遇見了老郭。我哭着對他講了流產的事。他勸我不要難過，勝利快要到來，應當保重自己的身體。

一九四五年舊曆六月末，老郭隨部隊開往東北，參加最後打垮日本鬼子的戰鬥。

不久，我又生第二个孩子。我生孩子那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们住在用松树枝搭的棚子里，到处都嘩嘩地漏雨。小孩下生后便死了。我呢，得了重病，大量流血，身上燒得象火炭一样，躺在草堆上，不省人事。这样过了五、六天，我仍然昏迷不醒，眼看就不行了。因为婆婆眼瞎，小叔侍候我又不方便，婆婆托人給我媽捎了信。媽听說后，哭了十八里地来看我，这时我已奄奄一息了。舅公和小叔把抬我用的席头和繩子，还有埋我的地点，都准备好了。媽把我抱起挪到干地方。由于連雨，又是伏天，我身下已經生蛆了。媽侍候我几天，邻居用土法替我医治，我居然漸漸好起来了。但我从那时起終生不能生育了。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我生儿养女的权利。

翻 身

日本鬼子被打垮了。我们家由游击区变成解放区。翻身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了印把子，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我娘家也分得了土地。人民依法镇压了恶霸地主“狠毒虫”——刘荣。在这次革命风暴中，媽也受到了锻炼，于一九四九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我的大弟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那时起，我娘家的苦日子才算熬到了头。这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共产党！

土改时，婆家也分得了房子和土地。在我们家住的人民

解放軍同志，聽說我們老郭也在部隊上，都親熱地管婆婆叫娘，管我叫大嫂，他們幫我們挑水、打柴、掃院子。部隊首長聽說婆婆眼瞎，找來了軍醫給她治眼睛，軍醫想盡了方法，終於使婆婆那雙瞎了二、三年的眼睛又能通路了。這又是因為有了偉大的共產黨！

現在，老郭在鐵嶺橡膠廠當工會主席，我也當上了工人，並且從一九五五年起，我也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雖然萬惡的舊社會使我沒有孩子，可是當我看到廠子裡的姐妹們，從懷孕、分娩到撫育子女，都受到黨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時；當我每天上下班從托兒所門前經過，看到孩子們一個個蘋果般的小臉時，我心里總是暖呼呼的。這些年輕的姐妹們，這些可愛的小寶寶們，生活在今天該有多麼幸福！這都是因為有了偉大的共產黨！

从黑夜到天明

彭景春 口述

馬凤舞 整理

“是亲三分向”嗎？

一九三七年，我家住在热河省新輝县碑子府区葫蘆头沟村。我十二岁那年，家中六口人，房无一間，地无一壠，住在老張家的破馬架子里。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一天，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說：“孩子，投奔你舅舅家去討个活命吧，是亲三分向，总不会挨打受气了。”

我高兴得急忙赶到瓦房沟舅舅（地主）家去。哪想到狠心的表哥刘秉忠六亲不認，从骨灰里也想压出油来，把我这十二岁的孩子当半拉子使唤。

那年夏天，在一个万里无云、暴热的中午，人們剛放下飯碗，还在歇晌呢，刘秉忠便催促我下地。那陣，我还没有鋤把子高，哪会鏟地。我扛起鋤头剛要走，刘秉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表嫂，提一罐子水交給我，讓帶到地里去，接着刘秉忠又牵来两头毛驢交給我。我怎能带这么多东西，但也不敢不带，便把水罐子系在鋤杠上用肩膀擻着，一手

牵着两头毛驢走出村外。天气悶热得很，夏虻叮得毛驢乱蹦躑，不爱迈步。我用力拖着驢往前移动，它还是走得很慢，越走得慢我越觉得吃力，上边压得痛，下边滾热的沙土地烫得两只脚丫不敢着地，手臂拉得发酸，头晒得发昏，汗水浸透了破烂的背心。我暗中不住怨恨刘秉忠，心想：“这就是母亲所說的‘是亲三分向’嗎？不是亲戚又該怎样苛刻呢？誰家有錢的孩子，这陣不是躲在大树下乘凉呢？我这是为了什么……”正在这当儿，刘秉忠赶上来，那双凶恶的眼睛直盯着我，厉声厉色地責备道：“他媽的！还在这里泡蘑菇呢。”“驢不走啊！”刘秉忠听我分辯，便抄起鋤头往驢屁股上猛揍两下。毛驢子惊了，便尥起蹶子跑起来，“你看，是驢不走？”不容分說，乒啪嘎嚓，刘秉忠的鋤杠便落在我的腰上，鋤杠打断了，我被打个趔趄倒下去了，罐子、碗摔碎了。刘秉忠看着折断了的鋤杠，摔碎了的罐子和茶碗，象割了他的肉一样，心痛得气不从一处来，抄起半截鋤杠，又朝我身上乱打。“我不打死你就不够本。”刘秉忠一面打一面罵。

刘秉忠見我被打得哭不成声，才揚长而去。我疼痛难忍，咬紧牙关强站起来，一跛一顛地爬过土岭。肚子痛得实在支持不了，扑通一声栽下去，捂住肚子哭起来。

刘秉忠在家过足了大烟癮，下地巡視，見我躺在地上，冲到我跟前踢两脚說：“我不能养活你这白吃飽。”接着又一陣皮鞋底，落在我身上。这一陣毒打使我昏过去了。現在每

当天阴下雨我的腰部还发疼呢！

待我清醒过来，天色已晚，我連爬带滾下了土岭，回到刘秉忠家。下晚飯也沒吃，躺在馬圈旁的光地上，暗中落泪，寻思着：“到舅舅家来，哪是討活命，真是羊落虎口，再呆下去，定要死在刘秉忠的手里。在这样的世道里，門当戶对是亲戚，穷富之間結了亲也是仇人。”那天夜晚，我越想越恨，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跟着村上的牛群逃出了虎口。

天下烏鴉一般黑

在回家的路上，我老远望着村上的树梢，眼泪便泉水般涌出来。一进屋，我滿腹伤心話什么也訴不出，便倒在母亲怀里一个勁的哭。母亲的眼睛也开始湿润了。当母亲听我说不願再到刘秉忠家去时，便責备我：“到亲戚門上不爭气！”說着扒开衣服举手要打。啊！血淋淋的伤痕，紫一块、青一块地展现在母亲眼前，媽媽的眼泪随着放下的手臂簌簌地落在我身上。她哇的一声，抱着我哭着：“孩子，媽錯怪你了，哪曾想骨肉血亲也能在你身上下毒手，天啊！这是什么年头，亲戚不象亲戚，天下的道路千千万，怎么就沒咱們穷人的活路呀！”

半天过去了，慈祥的母亲也无法可想，一面給我补衣服，一面劝我說：“人爭一口气，佛爭一爐香，你要是走一处敗一处，大了誰还要你扛年作，不給人家使喚怎样活命呀！吃人家的飯，服人家管，还是到你舅舅家去吧！”可是，

我想到刘秉忠那猙獰的面孔，恶毒的心肝……

第二天早晨，我拿起母亲給我补好的鞋走出門，向瓦房沟相反的方向跑去。母亲惊讶地問道：“小景春，你往哪里跑？”“媽！我害怕，我不敢再进瓦房沟，刘秉忠会吃了我呀！”母亲追着、罵着，但，我心一橫跑了。

白天，我沿途乞討，夜晚蹲在村头破庙里。走了三、四天，来到东城子。有人告訴我这里离我家有二百多里路。我心中暗喜，这次可逃出了虎口，再不受刘秉忠那些地主們的打罵了。一天，我到村口尋水喝，經一个姓張的老汉說合，給大地主鍾海泉放牲口，我同意了。每头牲口一年二斗粮，共放七十头。我核計着一年能掙十四石粮，比我父亲扛年作掙的还多呢！心中暗暗欢喜，干得挺起勁。每天早出晚归，終日在荒山野外和牛馬打交道，两腿跑得酸痛，脚被“天草秧”根子扎得冒血，早晨醒来，脚疼得不敢着地，但我从不在人前叫声苦，一咬牙走出去。

一天，我上树砍鞭杆，不慎失足落地，腰被苞米槎子扎个窟窿，昏迷过去了。姜大娘把我送回村，伤口还在冒血沫。过两天，伤口化膿了，半拉身子疼痛难忍，下晚躺在大門洞里，飯也吃不下去。鍾海泉走来对我說：“牛倌，我給你調治一下吧。”說完，讓佣人抓把蕎面給我搽在伤口上。虽然伤口疼，我一天也不敢歇工，唯恐地主借口克扣工錢。其实，在旧社会，剝削階級掌握着刀把子，殘酷地欺压人民，何愁沒有借口。我帶病給鍾海泉放牲口，三个月过去

了，农忙的紧张阶段也过去了，鍾海泉借口我小，看不过来那么多牲口，便将牲口赶到北大荒去放，只剩下二十多头留在家让我放。

大地主鍾海泉和刘秉忠不同的只是他外表“善良”，骨子里却是杀人不见血。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鍾海泉把我找去对我说：

“小牛倌，快过年了，你的工钱总共剩下五斗粮，折合五元钱，拿回去给你妈过年吧。”我一听激凌凌打了个寒战，往后倒退了一步，怒视着鍾海泉。这个老家伙，狞笑着说：“小孩，你听着：你穿我家鞋一双，扣粮二斗！……”不等他说完，我便急着对他说：“那双鞋和破棉袄是少奶奶送给我的，说我替她抱柴、烧火……”“住口！哪有那便宜的事。”鍾海泉打断我的话继续说：“一件棉袄折合粮三斗，估衣两件计洋十元，还有给你治伤口的药钱……”“你不能这样算，你给上的不就是蕎麦面吗？”“牛倌，别急，这只是提一下，让你记着大爷的恩典罢了，就不扣你的钱了。不过，你打坏了我的牛腿，牛吃了十服药，这笔药钱得记在你的账上。”“谁打坏牛腿了，牛蹄子扎上钉子长漏了。”“打的也罢，扎的也罢，你不打它能往钉上踩吗？仔细算，你还得找我钱呢！看你是个小孩，不和你一般见识，赏你三分情面走开吧！”“天呀！这是什么样的道理！”我暗暗叫苦，本想和他分辩是非，但是想到妈妈过去常说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我长叹一口气，走了

出去。天下的地主都是一样的呀！

家 破 人 亡

我又回家了。一看那情形，心象被刀攪似的难受。父亲被抓劳工后，音信皆无。沉重的生活担子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苦难的生活熬煎得妈妈骨瘦如柴，疾病缠身。三十多岁的妈妈，额头已呈现出层层的面纹。盼亲人想儿子，哭得她死去活来，眼睛里透出一层玻璃花。

在家生活无着，为了帮助母亲挑起生活担子，我到二道沟老刘家去放羊。

母亲带着两个小弟弟和妹妹在家苦受煎熬。母亲被债务压得喘不出气来，勒紧裤带，带着病拚命地奔波。一天，母亲背着一捆山柴回到家，躺在炕上，伸手去拉弟弟妹妹，嘴唇动弹了几下，不知想说什么，一口气没上来，活活地累死了。

我从二道沟跑回家去，我们姊妹兄弟四人抱着死去的母亲哭作一团。多半天过去了，喉咙哑了，眼泪流干了。那阵，正是暑天，尸体不能久停，几家穷邻居想法给找个破衣柜，把母亲抬出去，准备安葬。正当这工夫，刘秉忠赶来，拦着众人不准埋葬。他说：“这样不体面，亲戚都觉得寒伧，砸锅卖盆也得买个棺材！”邻人一听，气得没法，便把刘秉忠领进我家破马架里，手指着一口没沿的破水缸和裂了三道缝的破锅说：“你姑母死后给孩子留下的全部家产都在这里，

砸了卖了就能买口棺材嗎？你姑母得病多年，連药是什么滋味都沒尝过，要有一点出路，人还能累死餓死嗎？要不，你刘家帮助孩子一把，給买口棺材，大家看着都好看！”刘秉忠本想借机会捞一把，現在一看，真挤不出油水，象偷嘴狗一样，悄悄地从人縫里溜走了。

母亲死后，我們兄妹四人孤苦伶仃，千斤的担子落在我身上。我年龄最大，才十四岁，着急上火病倒了。十二岁的妹妹和九岁的景玉、七岁的运来弟弟，在炕上圍着我哭，不断地叫喊着死去的媽媽。孩子們两天沒有吃东西了，我小小的心几乎快揉碎了，但是想不出半点儿活路。

當我們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在本村四大爷的再三劝說下，我被迫在出卖妹妹的契約上画了押。妹妹被拉走那天，象老鹰叨小鸡一样，她被强迫拉上驢背，哭得要死，几次从驢背上栽下来，不断地叫喊着媽媽和哥哥，讓我救救她。可是我这做哥哥的，真是死逼无奈，实在沒有办法啊！

妹妹被夺走后，我仍旧到地主家去放羊，家中只剩下两个小弟弟。那年春节前夕，地主照例給我結算好工錢，傍晚，我买了一斤米糖准备同弟弟在家一块过个团圓年。当我走进那間破馬架一看，屋內象冰窖一样，墙上挂的霜雪足有四指厚。我伸手摸摸半截开花被下的炕面，凉冰冰的。走到鍋台前打开鍋，啊！半碗糊涂都冻成冰了。我心一陣酸痛，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这时，弟弟景玉縮着脖子从外面钻进来，見是我便放声大哭。我把他摟在怀里，景玉面色蒼白，渾身

冰凉。他告诉我：运来弟弟昨天冻死了。运来原本没有病，活冻死的，临死前还不住地叫喊着妈妈、姐姐、哥哥，口口声声嚷着冷啊！冷啊！要景玉抱他起来坐一会，但景玉抱也抱不动。

听到这，我的心都疼碎了，在屋内一刻也呆不下去。连夜来到西山脚下，借着雪光，找到了死去的小弟弟。可怜的运来啊！瘦得皮包骨，死后还是缩成一个团。我忘掉一切，紧紧地抱着运来的尸体，眼泪落在弟弟冰冷的小脸上，嘴里不住地叫唤着：“运来！运来！你醒一醒，哥哥回来了。”可是运来弟弟是永远不会醒了！

牢记阶级苦 永做革命人

没有吹不散的乌云，共产党、八路军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来到热河省新辉县。我怀着满腔仇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亲身参加了解放我家乡的战斗，亲眼看到人民镇压了大地主鍾海泉。

回忆起我参军那阵，现在心中还激动得怦怦跳。我一到连队，首长、同志们和我乍一见面，对我就象亲兄弟一样。有一天我们行军走了几十里路。下晚，我没觉得怎样累，正在班里同战友们聊天，排长田中林端一盆热水放在我面前，让我洗洗脚再休息。我发起楞来，心里忐忑不安。排长看我不好意思，便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情同骨肉，患难相共，行军后一定要用热水烫烫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好

好爱护。”說着弯腰就替我脫鞋子……夜晚，我激动得沒有半点睡意，思前想后，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热呼呼的，被子蹬掉我也沒在意，心想：“革命部队可真好呀！我一生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这些阶级兄弟，是多么偉大，多么亲切啊！”这时，指导员李忠走过来，悄悄地把被子給我盖好，当我睜开眼看見指导员輕手輕脚地又在給其他战士盖被时，止不住的热泪又夺眶而出了。在一次急行軍中，我不知怎的肚子痛起来，不敢直腰，弓着腰勉强前进。被李指导员发现了，他追上我把背包搶过去，背在他身上，接着讓通訊員牵过他的馬要我騎，我不肯騎，他命令我上馬。一九四七年二月，我旧病发作，大口吐血，部队首长送我到后方医院休养。临行前，战友們圍繞着我轉前轉后，有人把自己的零用錢偷偷地塞进我的口袋。連长、指导员再三地囑咐我安心休养。我病重那陣，护士日夜守在身旁护理，給我注射、服葯，端水、送飯，寸步不离。那时我想：“我这个牛倌，一步登天了。阶级感情海样深，同志之爱胜手足，共产党、毛主席真是咱穷人的救命的福星啊！在旧社会病死、餓死有誰管你！我母亲一生不知道葯味是苦还是甜，死了也不知道患的是什麼病。我給地主扛活那年拉痢拉得提不起褲子，地主不讓在他屋里躺着，怕傳染給他們，我只得一个人躺在高粱地里。若不是八路軍救了我，还能有今天，不早就成了地下鬼了嗎？”

在部队党組織的殷切的教导下，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在

战斗中又受到了锻炼，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红旗下我立下了誓言：永做革命人。

一九四九年我转业到沈阳，在工厂工作。党把我培养成为七级工匠，以后又提拔我做国家企业的干部——技术保安员、工段长。党使我和景玉弟弟也团聚了，我们兄弟俩都娶妻生子，和大家一样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人能做工作的都做工作了，孩子们到学龄的都在学校读书。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从心眼里往外乐，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尽的力气。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曾出席了市、区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受到奖励。我和弟弟在工厂里，几年来，被评为厂和车间的先进生产者。我深深体会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里，是从黑夜到天明，同样的人，却有不同遭遇。常言道：翻身不忘解放军，幸福莫忘共产党，阶级仇恨要牢记，代代相传不忘本——这就是我的誓言。

春天的馬蓮

潘 映 雪

在寒冷的黑暗世界里，馬蓮长在大路边。它剛破土而出，便遭到人踐、馬踏、車压百样折磨，千般苦难。然而，在它憔悴焉萎的身体里，仍然饱含着旺盛的生命的活力，在等待着那一声春雷。

在旧社会，生而为貧雇农家的姑娘，做童养媳是一种极其普遍的命运。雇农的女儿刘凤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凤兰家住撫順新南堡，从打她記事的年月起，她印象中的家总是缺吃沒燒，母亲有病不能出去拾柴，給人扛活的爹掌灯时分拖着累乏的身子回到家，顧不得歇歇，轉身又得上山去撿干树枝。小兰和母亲拎个洋鉄桶跟在后面“咣咣”地敲，吓唬那四处出沒的餓狼。等爹撿够明儿一天燒的干树枝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上炕睡不一会儿，远处公鷄已經啼明了。爹又得起来給地主去干活。

有一天，出了一点意外，給地主老曹家放猪的哥哥，因为丢了一只猪崽，吓得跑得不知去向。老曹家几次三番逼着賠猪崽，母亲着急上火，又想念哥哥，熬糟得病越来越重，

终于撇下丈夫儿女死了。母亲一死，孩子们都没有了着落。爹把弟弟领走了，把四岁的妹妹和八个月的小妹妹都给人做了童养媳。

八个月的小妹妹，可算是世界上最年幼的童养媳，她只知道在炕上爬来爬去，怎么懂得已经降临到她头上的厄运呢！做小接媳妇虽说是大多数贫雇农女儿的普遍命运，然而这毕竟来得过分早了啊！她吃饭得人喂，大小便得人照料，谁来疼她，照顾她呢？婆婆家嫌她在炕上拉屎，把她放在院子里，任凭她满院子爬，小手小脸脏得乌黑。傍晚牛羊回来，一头牛一脚踩在小妹的脊梁上，把背上的皮踩掉一大块，露出鲜红的嫩肉来，可怜的小妹口吐黄水，奄奄一息。婆家一见这光景，索性连饭也不给吃了。小妹连饿带伤，活活折腾死了。

九岁的小兰踏进的这家是户破落地主。公爹已死，婆婆才三十多岁，精瘦，凶狠无情，守着一个宝贝儿子。还有一个爷爷公公（婆母的公公），一个大爷公公（婆母的大伯），大爷公公有两个儿子，也有一个童养媳，那年十一岁，算是小兰的小嫂子。小妯娌俩是一根蔓上的两个苦瓜。天天起得最早，倒了尿盆洗完手，先给婆婆装一袋烟，然后扫地抹箱盖，烧火温洗脸水，做完饭伺候全家人吃饭，她俩去喂鸡喂猪，等喂完猪收拾停当，全家都吃完饭了，她俩撤去炕桌在锅台上吃点剩饭。这还不算苦，最难挨的是一天没遍数的打。小兰正吃着饭，婆婆伸手两个耳光，打得小兰眼里

直冒金星。打完地主婆子才告訴：“夾菜，筷子不許碰着碗！”小兰正走着道，大爷公公从后边抬腿就是一脚，吼一声：“你蹦蹦什么！”踢得小兰心惊肉跳，这回留点神吧，不料婆婆从背后又是一巴掌，罵道：“誰走道脚往外撇，把脚后跟对在一起？”小兰赶紧把脚往里靠靠，婆婆又嫌擦褲腿費褲子，抄起燒火棍劈头盖臉地打下来。小兰去上廁所，時間长了，說是躲懶要打；時間短了，又說是原本沒有尿，上的什么便所？又要打。小兰抬眼看人，婆婆的长烟袋鍋“篤”一下刨在脑袋上：“看人不許蹙眉头！”赶紧把眼睛睜大吧，又是“篤”一下一烟袋鍋刨在脑袋上：“看人不許撩眼皮！”直打得小兰懵头轉向，也不知长了双眼睛到底該睜該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渾身上下一无是处。一天到晚是錯字当头。甚至別人的錯誤也責罰她俩。小叔子洗臉把水潑到炕上，硬賴小妯娌俩尿炕，挨了一頓揍；小叔子哥儿們偷嘴吃，事后推到她俩身上，又挨了一頓揍。总之，爷爷公公、大爷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未婚夫，誰都打，烟袋鍋、笞帚疙瘩、燒火棍、劈柴棒什么都使，婆婆常念叨：“打她們个根穷、苗穷、沒有大富大貴的命！”

婆婆拿出鞋底用香头点上行和趨，叫小兰照着納。到納第二双时，就不用香头点了，叫小兰空手納，可怜小兰七歪八扭找不到趨，婆婆一看变了臉，拿起針直往小兰手指縫里扎，小兰痛得钻心彻骨地大叫起来。婆婆鉄青着臉說：“看看你自己做的活，不成行不成趨，你还有臉哭！”小兰忍痛

拿起針哆哆嗦嗦繼續納下去，一不小心，錐子穿過鞋底錐進了膝蓋，鮮紅的血馬上滲出來了，婆婆在一旁冷笑：“該，錐透了才活該呢！”

小蘭常常一個人躲到廁所去哭，爹呀，你在哪兒，媽呀，你在何方？

（爹在地主家當牛做馬，顧不上他的女兒呀。媽已長眠地下，聽不到她的女兒在呼喚啊！）

抬頭看看天，幾朵白雲飄飄蕩蕩；低頭看看地，數莖衰草瑟瑟縮縮，有誰可憐可憐受折磨的童養媳，有誰救救孤苦無告的小蘭呢，她實在沒有活路了呀！

同村一戶地主家的媳婦（窮人家姑娘）因不堪虐待吃紅硃自殺，這使同命相憐的小妯娌倆也決定了走最後一條路——離開這個沒有窮人活路的世界吧。小嫂子偷着喝了鹵水，小蘭吃了紅頭火柴，然後兩個人一起到河沿洗衣服去。小蘭直覺得惡心難受，渾身火燒火燎，頭臉漲得通紅，突然，哇的一聲，翻腸倒肚地嘔吐起來。小蘭一吐，小嫂子也吐起來了。鹵水和紅頭火柴畢竟不是孩子們容易咽的東西，兩個小姑娘吃得不够量，沒有死，却折騰得一邊吐一邊在河沿打滾。有人看見以為兩個孩子得了急病，忙去告訴她們的婆婆。婆婆氣沖沖地跑來把要洗的衣服抱起，恨恨地說：“小接媳婦還要成精了！要成精得用火煉，等會回到家看用火煉你們！”說罷徑自回家去了。兩個小姑娘折騰得半死，卻不敢回家。最後一個過路的看她們可憐，攙扶着她

們，將她倆送回家去。婆婆一把抓住頭髮從炕上拽到地下，好一頓毒打，還不讓吃飯，不讓睡覺……

過了一些日子，婆婆說小嫂子命犯“簸箕”，把她賣了。

小蘭長到十八歲，地主婆子的寶貝兒子死了。婆婆說是窮人家的姑娘命孤，沒爹沒媽，

還“妨”她兒子，把小蘭賣了一百八十塊錢，嫁給三十多歲的鍋爐工姜連圃。

老姜為了娶小蘭拉了不少飢荒。婚後小蘭上苗圃去做工，夫婦倆拚命干活還飢荒，可是，孩子一個接一個生下來，日子越過越艱難。老姜經常覺得頭昏，走路腳象沒有根似地直打晃，但還得勉強掙扎着去干活。

偽滿倒台，國民黨來了，糧價象發大水似地往上漲，苗圃一連三個月不發工資，老姜渾身臃腫，全家生活陷於絕



境。小兰背了一麻袋曲麻菜、莧菜、小根菜之类的野菜，胳膊上还挎了一筐，上市場去卖，換回二、三斤豆餅，可是有了鍋里的沒有鍋底的，家里沒有柴禾，小兰去刨点槎子，精湿，点也点不着，只得一人掰一块豆餅啃着吃。

小兰求一起挖野菜的張大娘給她找个做飯的人家，張大娘說：“地方倒是有，”她看一眼九个月的淑芳，“只是这个丫头可不能跟着一块儿去呀。”

天空迷蒙蒙、阴沉沉，小兰抱着小女儿，全家都跟在后面，到老温家去。小兰紧紧抱着孩子，走得一步慢似一步，小兰情愿这样走上一年，走上一辈子，但愿永远走不到，永远别走到吧，因为到了地方，小兰就得把小女儿放在别人的炕头上了。

然而，越嫌时间快，时间就过得越快，老温家的房子已经出现在面前了。小兰一家跨进门，老温太太塞了一块饽饽在淑芳的小手里，孩子高兴地对母亲嬉笑着，不久，由于吃饱和屋里的温暖，慢慢地闭上小眼睛睡着了。小兰明白自己是该走了。眼光从小女儿逗人喜爱的小脸蛋上收回来，转过身，一想到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了，眼泪止不住滚滚落下来。两个大孩子看见妈妈一哭，抱住妈的大腿嚷道：“妈把小妹抱走吧，不给了，不给了！”老温太太不愿意了，“瞎，说给也是你们，说不给也是你们，快走吧。”小兰出了屋，站在窗下听，一心盼望孩子哭嚎，淑芳你快哭，哪怕哭一声也好，我立刻冲进去抱你一起回家。淑芳，我的宝贝，你快点

哭啊——然而房內寂靜无声，孩子睡得正沉，她哪儿知道生身的母亲正在和她“生离死别”呢。小兰听了又听，等了又等，始終沒有动静。她只得慢慢离开窗下，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朝来的路上走回去。来的时候怀里抱着女儿，現在，甩着两只空蕩蕩的手，哦，天啊，有誰可怜可怜一个做母亲的，把亲生的女儿还给她吧！她的心的每一道裂口都在往外流血啊。

不給，不給了，回去把她抱回来！

（不給，带着她就不能出去給地主家煮飯，有病的丈夫，两个飢餓的大孩子，全家人将怎么活下去……）

靠山屯大地主严文志家一共二十五口人。严文志排行老大，老二已死，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正要雇奶媽。老三是警尉，娶了两个老婆。恰好刘凤兰把九个月的女儿送人后，还有奶水，于是严家雇了一个人倒兼了两种差使。又是厨娘又是奶媽。严家每天不是她姨就是他嬸，姑爹、舅爷来往不断，哪天也得三十人吃飯。还养了五条大狗，把煎餅撕碎一喂一大盆。刘凤兰一天得挑十来担水，煎餅一烙，堆有一尺多高，爐火烤得胸前一片片往下脫皮。警尉夫妇三个吃小灶，炒辣椒、炒肉絲端上去，大老婆尝了半口，把碟子一推，摔摔打打地嘟囔：“穷人家姑娘不会做飯，炒的菜沒滋沒味。”刘凤兰整天忙得脚不沾地，还要从筋疲力竭的身体里挤出营养来奶地主的儿子。

講定的工錢是每月二斗高粱。到月頭劉鳳蘭領了糧，等晚飯後收拾完，背着糧食黑送回家去，在家不能久呆，來回五十里地，回來躺下不一會兒，公鷄已經啼明，又得起來做飯了。

有一天，劉鳳蘭正在刮土豆皮（每頓飯都必須刮一大盆土豆），她忽然看見老姜拿根棍站在院子門口，遲疑着不敢進來。大概老姜可憐劉鳳蘭送點糧得整夜奔波，所以自己掙扎着來了。她对警尉的大老婆說：“孩子他爹來取糧食來了。”“在哪儿？”“那不站在門口么。”大老婆瞧了一眼，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哎呀，你可別叫他進屋，我嫌惡心。叫他進馬棚呆着去吧。”劉鳳蘭不作聲，在倉房內打掃了一小塊地場，讓老姜在那蹲着休息。晌午，大老婆又趕來囑咐劉鳳蘭：“你給他盛飯用那個碗，”她用手一指地下，“可別用好碗，用好碗，往後咱們可沒法吃！”劉鳳蘭順她手指的方向一看，那個碗外面黑色里面紅色，原來是喂貓用的碗。劉鳳蘭氣得說不出話來，背着她用別的碗給老姜盛了飯送去。老姜蹲在地上吃，劉鳳蘭轉過身去直掉眼淚。臨走，劉鳳蘭見老姜身體太虛，怕他半路出事，就跟警尉大老婆說：“我送他一程行不？”“哎呀，做下晚飯都要不趕趟了，你還要送他？”劉鳳蘭只得眼看着衣衫襤褸的老姜扛着二斗糧，搖搖晃晃地走了。

這些日子，嚴家天天殺豬殺鷄宰牛，大吃二喝。待她也

居然帶了三分和氣。她正摸不透是怎么回事，鄰居叶大嬸對她說：“八路軍快要來了，这回咱們要翻身了。”刘凤兰半信半疑，也沒顧得細想，只是心中十分惦記家中有病的丈夫和孩子。她問严文志他媽这个月的工資是給苞米还是給高粱？等晚上好送回家去。老太婆說：“大姑娘，黑間送糧你不害怕嗎？白天送回去吧。願要苞米願要高粱哪样都行。你再給你女婿拿点大米去，你女婿不是有病嗎？路上慢慢走，不着忙，別累着了。”刘凤兰心想：嘿，真新鮮，以往我哪一次不是摸黑送糧？我成天汗一把水一把累断脊梁沒人問，怎么現在倒怕我“累”着了！

她背着二斗高粱在路上走，家里的境况又呈現在她眼前：炕上鋪着一堆草，乱扔着两三块磚头，臉腫得晶光錚亮的老姜和两个孩子就在草里蜷縮着，唉，連給他們洗洗縫縫的空儿也沒有啊。她越想心里越急，越急走得越快，快到家門口时，只見儿子拿了块象大米飯鍋巴似的東西在吃。她上前一把摟住儿子問：“你又去要飯了嗎？”因为家里自然不会有大米飯鍋巴。儿子把小手一舉說：“这是八路軍叔叔給的餅干。”“啊，八路軍已經到咱們家里來了！”刘凤兰跨進門一看，家已經完全变了样。門窗都修理好了，炕上打得挺干净，鋪着苫布，炕头躺着两个病員。炕梢堆着高粱米、大米、豆子等不少糧食，大玻璃瓶里装着豆油。除了病員，还住着团长、參謀长。他們个个和和气气，跟老姜象亲兄弟似的。除了炕上的糧食和豆油，他們还送了一些鞋子、

褥单等物品給老姜。吃飯时，大家有說有笑，十分熱鬧。部隊的医生給老姜治病，老姜晶光鏗亮的臉上开始出現了皺折，腫脹在消退，病情一日日有了好轉。

刘凤兰由惊喜、感激，終于認識到他們原是自己人。無論担任領導职务还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他們都是旧社会受苦受难的階級弟兄，旧社会受苦的不是一个刘凤兰，千千万万个受苦的階級弟兄用鮮血用生命才換来了今天革命的胜利。誰能拯救天下无数受折磨的童养媳？誰能使千万个家庭不再遭受骨肉离散的慘痛？誰能鏟除人間多少愁苦与不平？靠天靠地靠不上，靠統治階級发“慈悲”更靠不上，只有靠党的領導，靠團結，靠斗争！

刘凤兰的生活和全国人民的生活一起面临轉折点。

刘凤兰又上苗圃去做工，苗圃不是从前的苗圃了，刘凤兰也不是从前的刘凤兰了。她是生活的主人，心象长了翅膀似地直想飞。每天起早貪黑領着全組工人干活。紅旗竞赛中总是坐“飞机”（优胜），要有一回得不到飞机，她就得哭，就得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沒好好干呢！

苗圃調整編制，撫順矿务局运输部征求刘凤兰的意見：“上托儿所行不？”她回答：“上哪儿都行！”可是上托儿所工作首先得檢查身体，沒有傳染性疾病才行。檢查身体的前一天晚上，半夜刘凤兰就起来了，走到邻居窗下問：“老賈大妹子，現在几点了？”“才两点，还早着哪，你放心回去睡吧，天亮我叫你，管保耽誤不了。”刘凤兰回到屋里再也

睡不着，坐在床上等。左等右等，在她看来，天好象是不会亮了。她干脆穿好衣服跑到車站去等，到車站才三点多鐘。真比从前讀書人去考狀元还心盛哪！因为她是这样渴望工作，渴望着为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身体檢查合格，她成了保育員。穿上白罩衫，戴上藍帽子，多么干淨和利整。

一上班，她就搶着干最脏的活，把一大抱尿布抱出去洗，托儿所缺人手，她一連几个月在所內值班不回家。这是階級弟兄的孩子，革命的后代，她照料他們該有多么幸福！

一九五五年她被調到客运段，当元龙山站站务組长，在車站出入口檢票收票。若問她九年来工作如何，有詩为証：

雪天護爐，雨天送傘。

孩子叫你好阿姨，

老人称你女“狀元”。

女狀元呀女狀元，

时时为人忙幫艱。

問你动力从何来，

“雷鋒同志在前面”。

乘券人員帶飯，凡是放在元龙山站的，她都給热好，并把自己家的筷子带来供大家使用。夜班同志休息沒枕头，她用布縫了五个，讓同志們工作完毕后好好睡一会。見到老、弱、殘、幼旅客，她主动送进站、送出站。夏天从家里拿来壺碗，給旅客送水喝；冬天讓等車的老幼旅客进售票房取

暖。天下雨她把身上的小布衫脱下来给婴儿盖上。有一次一个学生仓卒从家里出来，穿得单薄，她把自己的棉大衣给他穿上。这样的事情几年来是多得说也说不完的。

说刘凤兰是女“状元”，这是群众对工作出色的人的称号。这是群众给她的荣誉，群众封她的“状元”。她一九五四年入党，从一九五五年起直到现在，连续被评为市或省的先进生产者。

她的家里挂满了各种奖状，除了收音机、坐钟等一般陈设外，书架上摆了很多人民文学、文学评论、语法修辞等文学书刊，显示了她的儿子的职业和兴趣。她儿子大学毕业后，现在在一所中学教书。老姜在挖掘机厂工作。大女儿已经结婚，连九个月时给人家的小女儿也已找到，曾回家来过一趟。

最近的将来，一桩喜事又将降临这个融融洽洽的家庭。刘凤兰也快要做婆母了，从我们的时代风格和刘凤兰的平素为人，我们不难想见这一对未来婆媳的关系。

一丛不起眼的马莲默默地长在大路边，严霜摧残不了它，马蹄踩不烂它，车轮压不倒它，等到寒冬褪尽，春天来临，它便以它生命的全部力量开放出蓝蓝的花朵，发出细细的清香，在不知不觉中愉悦着过往行人的心胸。

(徐德荣 插图)

三个年三十

丁立身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那个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一听到这歌声，吕官华便不禁沉浸在一段痛苦往事的追忆中。那是二十年前……

过了小年，旧历除夕临近，海城镇上，人来人往，有钱的人家张罗着大办年货。但是，那年月，这一切对吕官华一家来说都只有看的份，他们仍然是沿门乞讨。这天，官乐、官超两兄弟，要饭回来，一遍遍地问妈妈：“都快过年了，俺爹怎么还不回来？”“俺姐啥时候能回来？”

小孩儿们成年吃糠咽菜，就盼着过年，爹爹回来、姐姐回来，能够全家团圆，吃顿饱饭。他们充满希望地叨咕：等爹回来，等姐回来，捎钱回家买肉包饺子；他们不时地跑到门外去张望，盼望忽然在人群中发现爹爹或是姐姐的身影。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母亲心里的苦楚。爹爹在地主家扛

活，姐姐在纜絲廠當童工，“吃人家的飯，受人家的管”，什麼時候讓回家才能回家，東家老財他管窮人過不過年呢！爹爹、姐姐啥時候能回來，做娘的也是不知道。再說，就是回來了，就能捎回來錢，捎回來吃嗎？也難說啊！不過，雖說心裡這麼想，嘴裡還是哄著孩子，自己也懷著朦朧的期望。要是他們父女倆都能平平安安回來，都能捎回來點東西，全家團聚過個年，唉，那該多好，那該多好啊！

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人還是一個不見回來。眼看就要到年三十了，丈夫不見回來，女兒不見回來，做娘的也跟孩子們一樣，緊叨咕，不住地上門口張望。但是人來人往，卻不見親人們的影子。

今兒個年三十了，該回來了吧？早晨盼到晌午，晌午盼到天黑，還不見人回來。唉，父女倆，哪怕回來一個也好呀！但是，掌燈了，附近響起了爆竹聲，還不見人影。孩子們問得更緊了：“爹、姐姐怎麼還不回來？”“快啦，快啦，快回來了。”媽媽回答說，但她心裡也在問：“怎麼還不回來？出了什麼事？……”

“爹、姐姐能帶回來米面吧？”孩子們又問。

“會，會，會帶回來，……”媽媽回答著，哽咽住了。

夜已經深了，劈劈啪啪的爆竹聲，劃破了夜的寂靜。孩子們困倦了，蜷縮著睡了，帶著甜蜜的夢。母親挑了挑油燈，拿起千補百納的破衣服，但她什麼也干不下去。她看看睡覺的孩子，望望窗外，听听動靜，……沒有，什麼也沒

有，丈夫不回来，女儿也不回来。盼望变成了担心，担心变成了恐惧。出了什么事，准是出了什么事！守着孤灯，她愈想愈伤心！……她有多少苦痛的经历啊！一九三〇年，她和丈夫吕宝伦，从山东逃荒到大连，靠丈夫卖短工，勉强维持生活。在大连混不下去了，又流落到海城。丈夫下乡给地主扛活，大女儿官华进新立号缫丝厂当童工。父女俩终年劳累，也养活不了家小。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在家还是靠乞讨过活。有一天，女儿小船和小容在外要饭，叫有钱人家孩子打伤，可怜四岁的小船儿惨死在村旁沟沿里；姐姐小容儿也在回家后三天死去了。女儿的惨死、无法伸雪的冤仇，是怎样地摧残着一个母亲的心啊。……现在，在这除夕的深夜里，父女俩都没有如期归来，怎不叫她担心！她思前想后，只觉前途一片漆黑。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有谁能给她一点亮光，给她一些安慰，一些劝解呢？她完全被悲哀压倒，被旧世界的黑暗压倒了。她拿起了绳子……

吕宝伦背着小行李卷，急急地往家走，过了腊月二十三，本应该下工，可是狠心的地主，又逼他多干了七天活，到年三十，都下晌了，才放他回家。吕宝伦腰里揣了十几元钱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快到半夜了，吕宝伦还在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直到三点多钟，他总算赶到了镇上。他放快了脚步，高高兴兴地走到家里。叫门，没人应，进屋，没有动静。“官华呢？他娘呢？”吕宝伦有些纳闷。他四周看看，啊，孤灯一盏，照着一个黑影悬在半空：“啊！……”他觉

得眼前一片黑！他不知自己是怎样上前一把抱住吊着的人，怎样解开了繩索，把她放在炕上。

“他娘，他娘，他娘！”

沒有应声。她已經离开人間，永远离开了。

呂官华三十晚上在繅絲厂也沒有休息。貪財的資本家不但不放假，还把工作時間延長到晚上九点。下班以后，还不准回家。呂官华劳累一天，晚間就倒在破倉庫里（这就是工人的宿舍）睡覺。她睡也睡不着，挂念着媽媽和小弟弟，挂念着在乡下扛活、不知回来沒有的爹爹。好容易熬过一夜，天亮了，呂官华一骨碌爬了起来。可是，不等她回家，爹爹却来了。“你媽，她……”爹爹泣不成声，把媽媽的死告訴了女儿。官华一听噩耗，象劈雷兜头打来，她只觉头昏腦脹，倒在爹爹怀里，父女俩抱头痛哭一場。他們一边往家走，一边哭，进得家来，呂官华扑在媽媽身上，嚎啕大哭，但是媽媽靜靜地躺着，她已听不見女儿的呼喚了。

万户欢乐的大年初一，他們凄慘地收殮自己的亲人。那十几块卖命錢，沒有买米，沒有买面，只換来一口薄板棺材！

这就是二十年前，那一件永远不能忘記的往事。它永远伴着仇恨留在呂官华的記憶里。

二

又到年三十了。乾坤轉換天地变，这是怎样欢乐的年三

十啊。解放了，翻身了，工厂成为人民的了。吕官华在一九四九年到盖平纜絲厂当工人。一九五〇年春节，这是她作为新中国的工人所过的第一个春节。

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

离过春节还有好些天呢，工厂就統計，有誰回家，到什么地方去，好給准备火車票、汽車票，誰家有困难，工厂給补助。这一切，对吕官华來說，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她沒有回家。爹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把两个弟弟带去了。她就自己留在厂里过节。

留厂的人有一項光荣的任务：护厂。工厂是国家的了，咱工人是主人了，得好好保护工厂。姊妹們在一起，到处巡邏。吕官华觉得这种全新的生活甜滋滋的。她和几个姊妹一起走着、唠着。

“如今的工厂再不是监牢了，有多好啊！”

“真好，做梦也沒有想到能这样好。可是，我还想走。”

“走？到哪儿去？”

“参军，当女兵呀！当兵、革命，有多好！”

“我也是想去！”

年青的姑娘們，充滿了美丽的幻想和革命的理想。吕官华更有一件心事：她当时还不能完全認清革命的形勢，她怕八路軍还会走，她想，“八路軍走了，咱工人又掉到后娘手里了。”只有当了兵，才能永远跟八路軍在一起。她决心永远跟革命走！

她們走过厂房、走过宿舍。——你看，再不是睡仓库了，宿舍里鋪是鋪、盖是盖，整整齐齐；走过食堂——多好的食堂，再不是坐在厂房里吃黑窝窝头了。

年三十到了。吕官华和姊妹們一起买了爆竹来放，劈劈啪啪，这响声就象在替她們欢呼新的生活。食堂里包饺子，姊妹們都去帮厨，剥馅的、和面的、擀皮的、包的、烧火的，說說笑笑，熱鬧极了。这是一个人口多么兴旺的大家庭！吕官华眼里充滿了泪水，她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她偷偷擦掉眼泪，走到門口，望着远方。

“媽呀媽，你要活着該有多好！”她想起了慘死的媽媽，想起了过去的苦难……使她更強烈地感到新生活的美好。泪水使她的眼睛又模糊了。

三

現在的吕官华，有一个美滿的小家庭。丈夫李师湯，是县食品厂的工人，先进工作者，两个男孩，都已經上学了。每逢过春节，那是怎样的熱鬧。魚、肉、白面、苹果，应有尽有，新年画貼滿了牆。孩子們兴高采烈。

全家人团团圍坐，包饺子。吕官华包着包着，泪水滴落在桌上。

“媽媽，你为啥哭？”孩子們奇怪极了。

“想起从前了唄！”吕官华說，“在早，咱們哪有什么年节！出外要飯，弄得好，有点剩飯剩菜吃，要不着，就餓

着肚子过年！……”她哽咽住了，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久久不能說話。

“媽媽，你想啥呢？”

“想你姥姥！她死得太早了。她死的时候，就我現在这个年紀！”

“姥姥为啥不乐意活呢？”

“她沒吃沒穿，叫穷逼的，叫地主逼的！要不解放，沒有共产党毛主席，我还不也跟姥姥一样，早死了，哪还有今天呢？哪还有我，有你們呢？”

母女两代，两个时代，两种命运，两种生活！

呂官华回忆着，引导孩子們看看过去的苦难，才能更懂得今天新的生活的可貴。

孩子們高兴地出去放爆竹了，呂官华煮着餃子，泪水又充滿眼眶。“我那可怜的媽媽呀，你就是死在年三十！你想煮頓餃子过年，沒想到；你想亲人們都回家来，哪怕餓着肚子，团圆一下也好，就这，你也沒盼到！……”

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在呂官华的記憶里，这过去的事永远是清晰的，牢牢地記着的。怎么能够忘記，越在幸福中，越不会忘記，越不能忘記。

三进“連生店”

新民县兴隆人民公社 陈大娘 口述
新立屯大队姜家崗子生产队

贾恩和 整理

我家原住辽阳县青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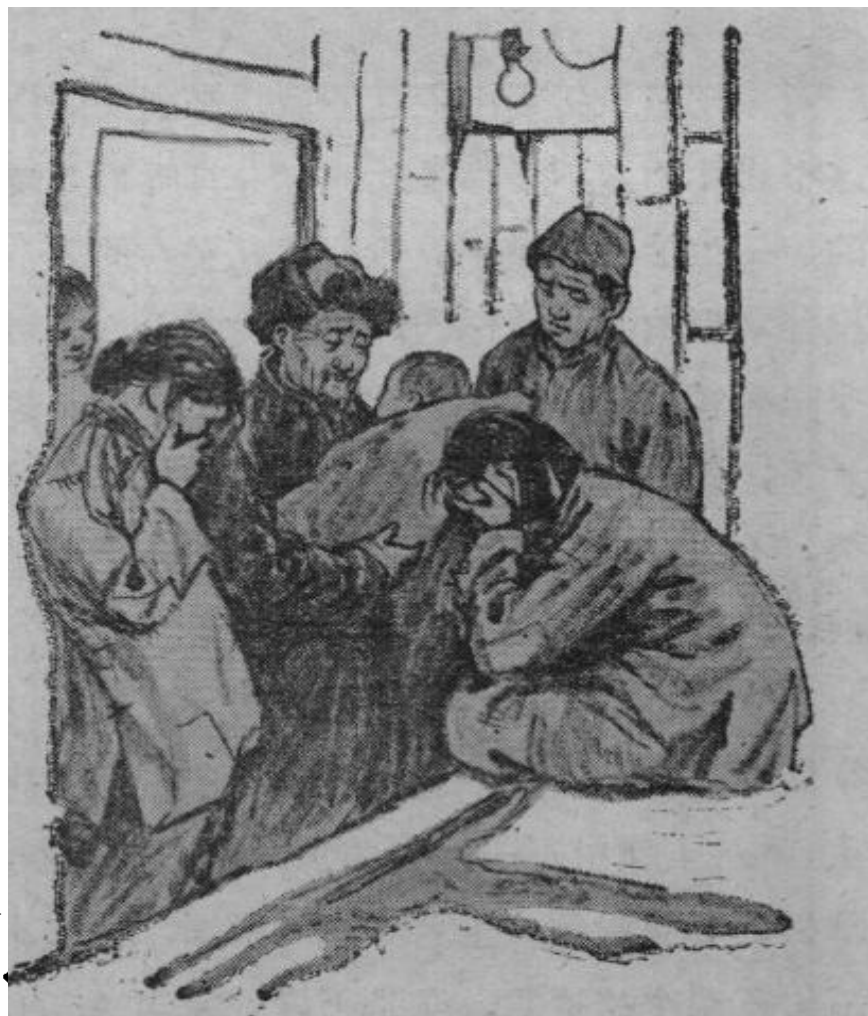
我三十一岁那年冬天，有一天雪下得很火，我丈夫背着女儿肥子，我抱着刚刚四个月的二女儿，在溜滑的冰道上走。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我们心里也象堵了一个大冰块。凶狠的地主把我们撵了出来。听说沈阳（当时称奉天）有雇奶妈的，无奈我们只得含着眼泪去试试，想一面给人家奶孩子，一面奶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离开了青堆子。

点灯时候进了辽阳城，我个小店住下。店掌柜的问我到哪去，我照实说了。掌柜的说：“当奶妈不许带自己的孩子。”我一听心凉了半截。掌柜的说：“把孩子送给人吧，不然人家不雇。”我紧抱着孩子，怕人家抢去似的说：“这可不行。”我和丈夫说：“咱们回家吧。”又一想，家在哪呀？去讨饭，孩子得饿死。不如让孩子活命，把她送给人

家。

第二天早晨，店掌柜的就把送孩子的事传出去，可是没人要。正在这时候，来了个好心的老曹头，他说，

“把孩子给我扔下吧，日后谁要我就给他，不然我养着。”我听了



这话象抓心似的难受，眼泪刷地一下子从眼窝里流出来。孩子正睡觉，她哪知道妈妈把她给了人家！我的眼泪淌在孩子脸蛋上，两只胳膊象木头似的勉强把孩子抱起来。我说：“孩子，妈有罪，对不起你，你……你别怪妈……”孩子象懂事似的，张嘴哭了。我亲着孩子的脸，忘了给孩子吃奶。老曹头眼泪巴巴地说：“再给孩子吃口奶吧。”我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哭得抽不上气来。许多住店的也跟着哭了。我丈夫也一边哭，一边劝我，怕我哭坏了身子。我一狠心把孩子交给老曹头，只说一句：“孩子别受委屈就行。”就哭得不成

声了。

一家三口哭着出了辽阳城，来到沈阳南关“連生店”。这个店住的差不多都是女的，一打听都是要当奶媽、老媽子的，一唠扯都是拋家失业、卖儿卖女的人，就都哭起来。店里孙掌柜的說：“你們哭，把奶哭上去，可沒人雇呀。”大家嗯啊答应着，可是誰的眼睛也沒干过。黑天，我就想起孩子来，哭了一陣，又想起孙掌柜的話，就自己解劝自己，不哭，不哭，但怎么也忍不住淌眼泪。多亏有小肥子在我跟前，还好一点。

这个孙掌柜专门包攬当老媽子、奶媽的事。人們就把这个店叫“老媽店”。我們这些人住着不要店錢，誰要是雇出去，就从工錢中每一元扣两角。他还給这些人做保。这天，孙掌柜的对我說：“王老爷家雇奶媽，你去不去？”我一看他后边还跟个挎枪的，准是王老爷家当差的。我問：“多少錢？”孙掌柜的說：“一个月二十元。”他后边那个当差的指着我的女儿小肥子說：“不行，她有个孩子。”后来經孙掌柜的一說，一个月減到十八元，当差的說还得領小肥子去問太太。我跟他去到王公館，老爷叫王子新，太太叫李惠君，瘦猴似的，說話关里口音。当差的和她一說，她看看小肥子，問：“多大了？”我急忙說：“十二。”她閉上眼睛半天才說：“行吧，喂狗的飯也够她吃了。”我又領着孩子跟当差的回“連生店”，写了三年合同，孙掌柜的保，又付了保錢，和丈夫流着泪分了手，跟当差的回王公館去上工。

李惠君讓原来的焦奶媽把孩子交給我奶。焦奶媽告訴我，这孩子大名叫王作昌，小名叫傻子，是王子新小老婆高玉艳养的，十一个月了。又告訴我当奶媽不容易，可要小心呀，我用心地記着。这时候，王子新的媽媽死了，整天忙着办丧事。一天晚上，王子新对李惠君說老太太的灵該运回老家去。第三天早晨，就叫我女儿小肥子和焦奶媽还有高玉艳跟灵車走。小肥子沒离开过我，哇哇直哭，李惠君說：“哭啥，穷崽子。”焦奶媽急忙把小肥子抱上車。大車呼嚕呼嚕地赶跑了。

过两天，我抱着孩子，和李惠君一起，也来到新民萎家崗子王子新老家。一进院子，小肥子直扑奔我来，我多想摟摟她呀，可是怀里有別人的孩子，松不开手。李惠君瞪小肥子一眼，小肥子站在一边不敢上前。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轉。我跟李惠君往上屋走，小肥子扯着我的衣裳襟哭。

王子新李惠君两口子对奶媽太狠了。有一次因为沒送平洗完的尿布，李惠君就恶言恶語地罵我。我气得說：“我給你支使，我还挨你罵，我不干了！”李惠君說：“三年合同在这，你敢走？”命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往哪走呀？在人家面前不敢哭，到晚上躺在西屋北炕梢偷偷地哭。小肥子摟着我的脖子哭着說：“媽，咱不在这受罪，回家吧！”家，哪有家呀！我想起老家，想起那剛剛四个月就給人家的女儿，泪水湿透了枕头。

又一次因为孩子哭，王子新听到了，喊我去。他問孩子为什么哭？我說：“剛睡醒，給奶不吃。”他拿大烟袋鍋子照准我脑袋上打。我的头頂上起了好几个大包，連揉的工夫也沒有，赶紧去哄孩子。

从此，王子新两口子对我们娘俩更刻毒，李惠君讓小胖子给她捶腿，一宿一宿捶，打个盹，就挨打。还讓她給倒尿盆、洗褲子……。

过完年，我丈夫从辽阳来了。一家三口人团圆，很乐。可是，这不是自己家呀。我胆突突地上东屋去，李惠君正和王子新躺在炕上抽大烟，头也沒抬，問：“什么事？”我說：“太太，我男人来了……”她一听从牙縫里說：“多此一举。”我央求說：“他就在你老人家手下做点事吧。”王子新开了腔：“給老太太看坟去。”我想說再換个别的活干，人家不答理。无奈何，我丈夫只得在死老太太坟旁边搭个窩棚看坟，穿着薄棉袄，白天冻得打牙，夜里更不好过。过十几天，我丈夫不干了。

奶人家孩子，哄人家孩子玩，我就常常想起我那四个月就給人的女儿，她也該会爬、会笑了，可是她在哪呢？我一哭，李惠君看見問：“哭什么？”我不敢說我想孩子，就說：“我是漏风眼……見风淌泪……”她狠毒地說：“你哭可不行，奶吊上去孩子吃什么！”我咬紧牙，把眼泪往肚里咽。把他家的少爷用奶水喂大了，撒了手，我就說：“太太，我沒奶了，不干了。”李惠君一听来了火：“你錢掙足

了，走你的。”我要領我女儿小胖子，她不叫領。小胖子还得受他們使喚，三个月后才跑出来。十五岁就过門到老李家。

二

我在王家受了二年罪，一个枕头沒干过。出了王家象出籠鳥似的，可是有鍋底下沒鍋上头的。一年后生下第三个女儿，这时候家里穷得拿不上手来。沒吃沒穿，我又想到要飯，可是孩子怎办？一想，还是得当奶媽去。我就含着泪，咬着牙，把这个八个月的女儿卖给韓家崗子老夏家当童养媳。我又离开丈夫，一路哭着上沈阳去，进的还是孙掌柜的“連生店”。

这回給一个姓孙的人家奶孩子。这家男人在紡織厂当經理，老婆潑辣厉害，孩子一哭，她就瞪眼罵。我受不了，又换了家姓崔的，男人是法官，他老婆和李惠君差不多，抹柜擦箱不知多少遍，还嫌我收拾得不干淨，起早貪黑，洗衣服、倒尿盆什么都干，比使喚牛馬还厉害。

在这两家受两年多罪，我又回姜家崗子去。

日子不好过，偏偏又生了第四个女儿。孩子四个月瘦得皮包骨，不想法子就瞪着眼睛看着餓死。后来不得不把这个女儿給藍旗堡子老高家。孩子一离奶头嘴，就象把我的心揪去一样。天哪，我怎这个命！我咬在苦瓜尾巴上了？我的孩子也咬苦瓜尾巴上了？我的眼里沒了泪，就是酸。黑天，我

睡不着，干瞪眼，有时糊里糊涂地梦见我的几个孩子都在我身边玩，伸手一拉，扑个空，机伶一下子醒了，哪有我的孩子，只有破炕席和一块砖头。

我叫着孩子的名字：“二丫，三丫，四——丫！”誰答应呀，只听见地主王子新家的狗汪汪乱咬。我就想，不如死了好，吃毒药，投大河。有一次我想着，想着，就往河边走去，忽然又想到，我死了，这几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要找媽，上哪找去？扔下我丈夫可怎么过……我又下不了这个狠心了，站住脚，心怦怦乱跳。天哪，你給我指条路吧！

我瞪着眼，想呀，想呀，又想到老路。在亲戚老李家弄几个錢，又上沈阳去。我推开“連生店”的門，孙掌柜的說：“又是你！”我說不出話来，点点头，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孙掌柜又給講到小东門外老張家当奶媽。一年半后，孩子給人家奶大了，我也瘦了，人家就不要我了。

我丈夫給三里屯地主老郭家煮飯，我拾柴，做小工，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一九四一年，我四十八岁生了个老女儿，我可稀罕她了。抱着这个女儿，又想起头几个女儿。我讓我大女儿上藍旗堡去看四女儿，大女儿哭着回来，一問，死了。我又哭了一場。唉！我生了不少孩子，只剩下两个，怎么不寒心啊！

因日子不好过，我丈夫常去要飯，到底走上这条靠大門的道啦。

一九四七年冬天，有一次我丈夫剛要二升米回来，国民

党紅眼队就来搶粮，我丈夫不給，紅眼队用馬棒打他，我去拦挡又打我，把我丈夫渾身打得靛叶青。米搶去，丈夫被打伤，躺在炕上起不来，以后就死了。

多半輩子苦，把我眼窩哭塌了，左眼瞎了翳，两只眼皮象网扯着似的綳綳紧，泪水三大缸也裝不完呀。

三

多年的枯树开了花，我这被泪水泡花的眼睛見了青天。解放了！天也变了，地也变了，穷人过上好日子。我的老女儿上了学。头几年她和我說将来有拖拉机种地，乡下也安电灯，我不信，心想，人家王子新那么有錢有势还安不起电灯呢。可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真的都有了。不久，又买了收音机，里边吹打彈拉唱，又說又講，坐在炕头上还能听北京毛主席講話。过去，我只想有口飯吃就心滿意足了，做梦也沒想到有拖拉机种地、听收音机呀。

一九五九年，我上沈阳去。多年沒去，沈阳也变了样。那个坑人的“連生店”早沒了影，大街上拉洋車的、要飯的、拷洋刀的都沒了。过电車路，我摔个筋斗，人民警察赶快把我扶起来。現在过上蜜一样的日子，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

我老女儿今年二十二岁，入了党，当上队里干部。我一看見我女儿就覺得越活越有勁。我常对我老女儿說：“你們年輕人趕上好时候，苦里生甜里长，甜里生甜里长，媽象你

这个岁数早就开始受罪了。媽今年七十岁了，这多半辈子苦，三进‘連生店’，三次舍孩子，那个血泪日子，你可要記在心里啊。”

(于明厚 插图)

半升米

傅 群

四十多年前，那还是在东北军阀统治的时代。

在贺乡正（注一）家扛了十七年大活的胡永发，从去年挨了枪打以后，日子越不好过了。

六王屯有家大买卖东兴源，前院柜台上綢緞百貨、油粮酒肉，一应俱全；后院里成车的收买粮食，往沈阳城里运。开镰头遍地的时候，胡永发房后几垅豇豆该搭架了，家里穷得一根秫秸也没有，想上东兴源后院场院拣点零散秫秸。他刚走近那两丈多高的秫秸垛，炮手张伸就在屋里端起了“水联珠”（注二），一枪撂在大腿上。这样一来，胡永发就整整在炕上躺了大半年。

等他伤口长好，这年重又上工时，家里不只已无隔宿之粮，而且还整整欠了东家一年工钱。他的大女儿早出门了；

注一：乡正，军阀张作霖统治时代的职名。相当于村长。

注二：水联珠，一种步枪的名称。

小女儿在他躺到炕上后，送给了人。两个大儿子都当大半拉子，活不少干，却只能混上自己的吃喝。余下来还有三张嘴：胡大娘、五岁的三儿子和怀里抱着的老儿子。

经过胡永发恳求，少东家贺超答应他每干一天活，借给半升米，算是明年工钱的预支。少东家再三言明，这是看了胡永发在他家扛了十七年活的情面。

每天天不亮，胡永发去上工，天亮以后，胡大娘拿瓢去领半升米。转眼过了八月节，秋收快结尾了。

强壮的胡永发，这几天忽然得了病。浑身发软，吃不下一点东西。勉强支撑了两天，到第三天一早，刚站起来，就觉着眼前一阵发黑，跌倒在炕上。

快到晌午时，五岁的老三哭喊着肚子饿。胡永发在炕上翻了个身，说：“把那半升米领来吧。”

“没去干活，能拿得来吗？”胡大娘迟疑地问。

“咳，我在他家干了十七年，”胡永发又翻了个身，“这半升米，许能拿得来，你去跟少东家求求。……”

胡大娘迟迟疑疑地拿起瓢，走出门。不大工夫，又拿着空瓢走回来。直到迈进自家屋门口，少东家那铁青的脸色，还在她眼前晃动着。她没敢把详情告诉丈夫。

胡永发看见空瓢，猛地一皱眉，强撑着爬起身子……随即又倒下了。

胡大娘叹了口气，跟西屋借了半碗小米，熬了粥。丈夫喝了两口米汤，干的给孩子吃了。

下晌，少东家贺超找上门来。在院里就隔着窗槛嚷，
“胡永发，你他妈的有点良心没有？工钱头年就使唤啦，这是什么时候，大忙的，在家装病……”

五岁的老三，吓得偎在妈妈怀里。

“我去。我去。”胡永发在炕上颤巍巍地连声回答，
“明天准上工。”

五岁的老三觉得妈妈的手臂将自己越搂越紧，他扬头看妈妈，忽然，几滴温乎乎的泪珠掉在他的脸上。

头晌码秫秸垛。

在秫秸垛上，胡永发总感觉象是腾云驾雾，刚转动身子码了几捆，就天旋地转起来……不大工夫，底下扔上来的秫秸捆，竟埋没了腰。

他对底下的小伙子说：

“别扔啦，坐下歇歇吧。”

“打头的，你割地那么能耐，今天怎么啦？”底下小伙子笑着问。

胡永发叹了口气：“咳，我三天没吃东西啦。”

他闭上眼睛歇了一忽儿，弯下腰去抱秫秸，一边自言自语：“要照往常，码这点秫秸还算活……”忽的一歪身，天又旋转了……

头晌好不容易算挺了下来。

吃晌饭时，胡永发喝了半碗米汤，就趴在了条桌上。头

越发沉重，渾身越发沒勁了。他禁不住想：“要是在自家炕上躺一会儿，多好哇！”

在朦朧里，仿佛离着挺远挺远有人对他說話，是少东家的声音：

“胡永发，醒醒吧。下晌帶三个人，把上截子那块高粱槎子刨了。”

他清醒了。站起来，身子歪了一下，一个趔趄，赶忙扶着条桌站住了。少东家不由得看了他一眼，他的臉白得怕人。

少东家轉过臉，沒說話。

刨槎子是累活；在秋天刨当年槎子，活着的須根紧把着粘湿的泥土，刨出来，打淨了，尤其費勁。这种費勁的活，胡永发已干了三十五、六年，可他还从沒有过今天下晌这样的体验——手中用了几十年的半截鎬，象是一下子重了几百斤，咬紧牙，拚命地使出全身力量，两条手臂才哆哆嗦嗦地把它举起来。一弯腰，眼前就发黑。他搖搖晃晃，咬着牙，拚着命，每刨、打一个，渾身就涌出一陣虛汗……

随趔趄的伙計照規矩不能超过打头的。他們都为打头的今天这异常迟緩的速度吃惊了。三个伙計在后边，我看看你，你看看我，誰也沒說話。他們知道，照这样打法，干不出应干的活来，少东家不能答应，可是他們既不忍心催那一向剛强的胡永发，又不敢讓他歇息（說不定少东家会来查看）。看着打头的那搖搖晃晃哆里哆嗦的身影，他們心里翻滾着一股說不出来的酸苦。

刨了一个来回，日头已快平西。胡永发觉得全身酸软，站都站不住了。“要是在自家炕上躺一会儿，多好哇。”这念头又来缠绕他了。他坐到地上，不由自主地往后倒去。猛地又一个念头闪过：“活还没干完。今天活干得太慢啦。”他又强撑着坐起来，使劲对二打头的说：

“我不行啦。你带着干……欢点……回去好交代。”

夜色浓了。三个伙计才又刨完四条垄，胡永发只刨了一条零一点儿。他刚强地拒绝了伙计们的帮助。伙计们知道打头的脾气，只好扛着镢头回屯了。

地里只剩下胡永发一个人。

清冷的月亮从屯子后面升起来。一阵凉风刮过，他觉着从心里往外发冷。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多么空旷的田野！他往屯子那边望望，“要是在自家炕上躺一会儿，多好哇。”他想着，又咬紧牙，哆哆嗦嗦举起镢头。

“卜”，镢头刨得不深，槎子没出来。他又咬紧牙，可是手臂软软的，抬不起来。他只得又坐下歇息，“这会儿没人了，可以躺下了。”他想着，躺下来。……一阵凉风吹过，他哆嗦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睛，面前的这条垄好长啊，好象没个尽头。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家，那热烘烘的炕头，体贴入微的老伴，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远……这念头使他惊悸了。“不，得赶快干完，好回家。回家。”他爬起来。这恐怖的想法，使他拚出最后一点力量，哆哆嗦嗦地举起镢来，哆哆嗦嗦地刨下去……刨着、打着；刨着、打着……忽然，

他觉得胸膛里面发热，象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张嘴，哇哇吐了出来……眼前一片黑，月亮、田野、壟沟都沒有了。他一下子栽倒在壟沟里。

不知过了多久，他仿佛觉得有人推他，叫他。多熟悉的声音。渐渐地，他明白过来。两个儿子找他来了。

“我吐啦。迷糊过去啦。”他对儿子們說，勉强笑了笑。声音小得象蚊子叫。

在他身下，有黑乎乎一大摊什么东西。老二弯腰用手蘸了一下，粘乎乎的，細看看，惊道：

“哎哟，这是血呀！”

“誰知道吐的是啥。”胡永发用微弱的声音說。

“觉着怎么样？背你回家吧。”老大說。

“不怕。”稍停了一会儿，胡永发用微弱的声音說：“我这还有两根半壟。你們刨……刨完了……明……明天……好去領米……”

……

哥俩将父亲背回家里，已是下半夜。

胡永发终于躺在自家热烘烘的炕头上了。

胡大娘拿过油灯，照照丈夫的臉，白惨惨的吓人，再照照身上，禁不住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一身血，不是紫紅的，是鮮紅鮮紅的血！……

胡永发迷糊过去了，不住地翻身、打挺。

快天亮时，他才清醒了一些，叹了口气，象是对儿子，

也象是对自己說：“我今年五十一……你們好好过……欠东家的錢，你們哥俩……还……”翻个身，咧咧嘴，就咽气了。

天剛亮的时候，少东家賀超的二兄弟賀起，从他家后墙上伸出头来，对着胡永发家的窗戶喊：“老胡头，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起来，大伙早就吃完饭，就等你啦。”

胡大娘揩了揩眼泪，走到院里，大声說：“你別叫啦。他这輩子不能上工啦，等来世再給你們扛活吧。”

“怎么的，死啦？”賀起睜大了眼睛，縮回头去。一面自言自語地罵：“雇个短命鬼！用了那么多长支，什么时候还我們哪。”

.....

四十二年过去了。一九六三年秋天沈阳市郊新城子公社六王大队进行阶级教育的时候，胡永发的二儿子，現在年已六十的老貧农胡恩林向人們詳細講述了当年父亲惨死的这段經過。

在人剝削人的制度下，象胡永发这样被殘酷剝削致死的事情是很普通、平常的。仅仅在六王屯一个村落，胡永发同一輩貧雇农中扛活累死的就有十三人。其余的十二人，每人也都有着同样凄慘的命运、同样凄慘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我們这美丽、肥沃的广闊土地上，曾流下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泪，多少劳动人民的血啊！我們具体、深刻地了解了这些，

才能懂得为什么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为什么非在我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将革命坚决进行到底不可。我们也才能懂得，为什么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就在这个六王屯，就在胡永发活活累死的前后十年中，全村六十余户雇农，由于被压榨得实在喘不过气来，就曾自发地爆发了两次大罢工。夏锄的时候，正当十六户地主富农利用六月六日虫王节，聚会核计如何进一步压榨雇工之际，针尖对麦芒，百余名雇工罢锄了！贺超等十六户地主富农，在群众斗争的烈火面前战慄了，他们不得不给雇工们每人长了七斗粮。

評書演員話今昔

營口市曲藝團袁闊成 口述

趙博 整理

袁氏三杰

四十年前，在北京提起評書界袁氏三杰，沒有不知道的。他們是我的長輩。大伯父袁杰武（袁氏三杰之一），生得身材勻稱，濃眉闊目，一看便知是個精明強幹的人。他十八歲出師，便和大師兄、當代的評書名藝人王杰奎說對台。據說，只要王杰奎在露天書場開書，就象磁石吸鐵一樣，大街小巷的車馬行人全被他吸住了。真是行人忘記趕路，小販停止叫賣。有時由於車馬行人聚集街頭，阻礙了交通，把交通警察忙得熱汗橫流，因此，得名為“淨街王”。我大伯父敢於同“淨街王”說對台，他的藝術水平的高低是不言而喻了。

令人憤恨的是，舊社會對一個評書藝人百般折磨，大伯父年近三十，就精神失常了。在那個黑暗的年月，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有病難求醫。開始，有些醫生自動登門，幾乎

踏平了天井，挤碎了門框；等錢花光衣服当淨后，連个医生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就这样，为評书艺术費尽神思，熬干心血的大伯父。正当年青有为，便与世长辞了。

繼大伯父之后，二伯父袁杰英在北京說书四十多年，久占西安市場长順軒茶社，也頗有名气。他最善于幽默又留有余地，一个笑包袱讓听众听了回家也得笑三天。尽管如此，在旧社会也同样受尽了“糊涂”气。一天二伯父“下地”（說书）归来，路上碰到两位带枪的軍人，見面便問：“你叫袁杰英嗎？”“是啊，我……”沒等二伯父把話說完，那两个家伙便异口同声地說：“那好，跟我們走吧！”看样子不去是不行的。二伯父一边走一边試着探問，才知道是要他去說“堂会”。两个家伙带着警告的口气說：“我們老爷很看得起你，不过，你得注意，要是說出个‘春’字来，可小心你的脑袋！”这个“老爷”究竟是哪一位呢？二伯父納悶着步入大厅。大厅里富丽堂皇，寂靜无人，对着一面一人多高的大站鏡，便开了书，目不敢邪視，耳不敢杂听，說得口干舌燥无人送茶，累得腰痠腿疼也不敢坐下。就这样一連說了两个多月书，除了两个持枪的門卫以外，連个人影都沒看見，只是偶尔从挂着珠帘的内室里散发出一股鴉片烟气味，和不时地傳來使人欲嘔的嬉笑声。直到“堂会”結束，受完了气，遭够了罪，才打听明白，这“老爷”原来是一个軍閥手下的參謀长。你說这不是“糊涂”气嗎？二伯父忍气吞声，飽經舞台风霜四十多年，在国民党統治时期，为生活所

累，帶病演出，昏倒在北京東華門外張王茶社的舞台上。病後就醫，將幾年來仅有的衣物變賣一空，最後，幸亏同行的幫助，才免于黃土蓋臉。

伯父一死，父親失去了經濟上的援助，拖兒帶女，在北京維持不了生活，於是，全家便開始流浪天涯。

流 浪 生 活

全家從北京來到了天津，蒙書曲界老前輩陳士和先生的幫助才算落了腳。舊社會的藝人由於怕別人“頂行”，自己挨餓，所以“欺行霸地”，有好地（好說書場）都讓一些至親好友、同門同戶的人占着。我們只好在邊邊沿沿堵空兒說上几場，無風無雨每天只能收入元八角錢，無奈，父親便上“明地”（露天演出）。就這樣一家三口人的生活都極難維持，我就在那個困難當兒，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天津。富家生“貴”子高朋滿座，設宴賀喜，一個窮說書的添了孩子，就是添了憂愁。多亏一些好心的窮朋友，給了几升小米、二尺白布，才算糊弄過去了。

被生活所迫，听人說塘沽是魚鄉富地，在陳士和老先生的幫助下，全家又流落到塘沽。要說“富”，塘沽確實“富”，那些豪紳富戶，整天大魚大肉，酒氣熏天；要說窮，塘沽也真窮，貧民扶老携幼，倚門乞討者，觸目皆是，而且經常是一天討不了半罐米湯，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啊！到這里又听說趙格庄東礦生活好混，為了糊口，又奔赴東礦。

此刻正值严冬，一家四口人，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冻得死去活来，好歹算来到了东矿。然而穷困象恶魔缠身一样，任凭你走到哪里，也逃不出它的掌心。父亲常常勒紧了腰带拼命说书，仍然是顾了锅里，顾不了锅下。为了活命，老人家将我那刚刚十四岁聪明可爱的大姐，嫁给了一个矿工。大姐含着眼泪离别了一家人，据说第二年便上了头（结婚）。之后，全家又奔林西、山海关、锦州、沈阳……，总之，穷人的道路是一步一个陷阱，刚出龙潭，又入虎穴，走一处不如一处；直到最后，将全家仅有的两床被褥抵还了店账，求人寄款重返北京。一段苦难的历程，使二老失去心爱的女儿，骨肉深情象揉乱了的麻团拉扯不断，烦闷忧愁象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全家人坐在龌龊的车厢里，热泪盈眶，沉默寡言，相互呆望着，叹息着。

北京，旧社会的北京，粮价象潮水一样一天三涨，靠大家帮助好歹对付了一个多月。正值大年正月，听说张家口演员少，全家四口又冒风雪奔走，路过昌平县，因为没有住店的钱，只好住在孔庙的三间年久失修的配房里；房顶无瓦，窗上无纸，炕上无席，无情的风雪象出笼的猛兽一样往身上猛扑。夜里，我们蜷曲着身躯，咬紧牙关，忍受着风雪的侵袭。我那刚刚两岁的小弟弟，尽管母亲用体温暖着他，还是不断地嗷嗷嚎叫。弟弟的哭声，比风雪刺骨的滋味要难受得多；弟弟的哭声，常常使二老彻夜不眠。

这里根本没有书场，也没有茶社，临时在鼓楼下露天演

出，別說要錢哪，就是白說也很少有人受得了這樣的严寒啊！一天只掙兩三角錢，這個鬼地方，光煎餅就要兩角多錢一斤，所以，經常是全家人守着一斤凍硬了的干煎餅，伴着八行眼淚相互推讓着。

母親，可憐的母親，勞碌半生的母親，由於窮苦、飢餓、憂愁、疾病的折磨，變得瘦骨嶙嶙。一天，我和父親下“地”歸來，拿着一斤凍硬了的干煎餅，一進文廟的破院子，喊了聲：“媽媽”，媽媽沒答應，又喊了聲：“媽媽”，媽媽仍然沒答應。進屋一看，媽媽已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剛剛兩歲的小弟弟，嘴里含着母親那已干癟的乳頭在哭！啊！媽媽已經被吃人的舊社會奪去了寶貴的生命，我“哇”的一聲撲到母親懷里，煎餅從手里滑落到地上。媽媽生前沒過好日子，死後一領殘席卷埋於他鄉“義地”（一些外鄉人用錢捐置的亂墳崗子）。為了活路，忍痛將天真無辜的小弟弟給了人，只剩下父子一雙，舉目無親。當年，我才十三歲。

沒有路費，父子步行百里去通州，兩次求助於寄人籬下的大伯母，三次求助於陳士和老先生，走一地，演一地，餐風宿露，難得一飽。

一日來到了山海关，被生活所迫，又產生了二下關東的念頭。當時，藝人出關是不合法的，經別人出主意，父親假扮個掌鞋的，我扯着父親的後衣襟，剛剛走到剪票口，被日本鬼子一個大脖溜給打了回來。幸亏一位好心的站台工人向

鬼子說了几句好話，才連推代搯地混过去了。

到东北以后，我，一个十四岁的毛孩子，为了混碗飯吃，也不得不登台說书。記得有一天，我說得正起勁，只听“咣”的一声門响，从外边一溜歪邪地撞进一位警察“老爷”，到跟前，劈头盖臉就打了一頓，打得我鼻青眼肿，暈头轉向，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东北光复，国民党侵占了錦州。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說，有了自己的国家总会强得多吧！又兼，这时我和父亲一样已經正式登台說书了，爷儿俩总可以糊口吧。可是事情并不象我想的那么简单，就在这一年，和我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因为誤收了国民党特务的书錢，第二天，这个狗特务，帶了四个打手到书場，用盒子枪对着台口，硬把我父亲撵出了书場。父亲是个火性汉子，一气臥床不起。不久，便丢下可怜的我死了。

万恶的旧社会，象吃人的猛兽，吞噬了我的两个伯父和父母；万恶的旧社会，象杀人的强盜，夺走了我姐姐和小弟弟。袁氏門中，老小五口，只剩我只身一人，象一片經严霜摧殘的敗叶，在狂风暴雨中，飄零着，掙扎着。

四 喜 临 門

解放的紅旗卷走了漫天的烏云，我，一个受尽压迫的說书艺人获得了新生。我的大姐，同全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翻了身。估計我这些年一定是衣不遮体，食不飽腹，她穿着

整齐的衣服，带了点心和路费，从关内找到关外，想把我接回去学点手艺。可是，当姐姐迈进山海关永胜茶社，完全出乎她意料：我穿着崭新的演出服——毛料子大褂，在明亮的灯光下正说晚场，观众坐得满满的，都在凝神静听。

离别多年杳无音信的大姐突然来临，为我的新生活增加了欢乐的气氛。记得一次吃饺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过去惨痛的遭遇，想起至今还无信息的小弟弟，想起了爸爸妈妈的惨死，想起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也自然地联想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姐姐沉痛地说：“爸爸妈妈死得太早了。”“是啊，老人家要能活到今天该多幸福！”

大姐在我这儿住了十几天，看看我的处境也就不想接我回去了。她临走拉着我的手嘱咐说：“弟弟，我走了。要记住我们是穷孩子，多亏共产党才有今天，往下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本啊！”后来我和一个老艺人的闺女结了婚，婚后感情和谐，第二年便添了个闺女，给生活又增添了许多乐趣。

翻身应该好好埋头工作。当年我便在党的培养下，开始试说新书《吕梁英雄传》，在山海关演出时，还得了一面写着“发扬新内容”的黄字金边的红旗。

党的培育

党启发我，鼓励我，给了我试说新书的信心，并千方百计帮助我把新书说好。开始我想说新书，由于没有文化不能看

新书，党让我进夜校一连读了三年书，文化水平提高了一些。但是想到正式说新书，心里象揣个小兔子似的扑登扑登乱跳，总认为参加会演和正式为观众演出不是一回事儿，担心上座率下降，收入减少，有损名誉。这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祖国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在党的教导下，我逐渐认识到祖国无比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用鲜血为之奠下基石的。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当代英雄正在这座基石上日夜不停地添砖铺瓦。当时，党组织经常让我参加祝捷会，因为没有新段子，在这样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仍不得不上演《醉打蒋门神》。我想革命先烈和当代的英雄人物能够不惜一切为革命，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丰功伟绩说给听众呢？正在我新旧思想矛盾交锋的时候，党又及时地鼓励了我的正确想法，帮助我解除顾虑，并提出上述的思想矛盾是关系到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党的鼓励下，我便开始说新书。可是不几天，新的困难又来了，过去上十成座，现在只上三、四成座，顶多不过五成座。有的听众反映：“干脆换了吧！”自己又有些动摇了。党及时派人同我研究，终于找到了毛病，不是新书不抓人，而是我生活底子薄，表演有问题。因此，党便让我去营口县虎庄公社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去山区雒一公社为农民演出；并派一名干部陪同我去哈尔滨等地采访抗联的故事，帮助我改编、创作新

評书段子。党的关怀使我增强了信心，也使我忆起了往事，我那二位伯父才艺过人，在評书界也頗有名气，但毕生飽受欺凌，落了个十分悲慘的結局。今天，我这样一个极不成熟而又十分年輕的評书演員，却得到了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时代变了，生活在偉大的毛澤东时代，每个人的良好願望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党支持我說新书，我就一定能把新书說好，有党給我做后盾，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經過一番深入生活和勤學苦練，終于使新評书在舞台上又一次同观众見面了。而且上演比重逐漸增多，由每天一段增加到一場，直到全部上演新书；听众也由少到多，直到站排买票。

幸 福 的 时 刻

在旧社会里，飄零四海，最后只剩孑然一身人称“下九流”的我，今天居然成了营口市曲艺团副团长、市政协委員、市人民委员会委員，能經常和市首长坐在一起，討論政府工作和国家大事，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生活在偉大的毛澤东时代，許多在过去做梦都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一九五八年，党讓我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会演，在怀仁堂演出。一天，我們的周总理同党和国家的一些領導人也来听书。我和他們坐在一起，激动得手脚都不知朝哪儿放了。晚間我躺在床上，周总理慈祥的面孔，不时地浮上脑

海。兴奋使我几乎一夜不能入睡，想起了过去的悲惨生活，想到伯父、父母們死得太早了，沒能分享我的幸福；又想到了今天自己和祖国人民的幸福，不禁独自笑了起来。想啊，想啊，突然一桩心事悄悄地浮現在脑际，我什么时候能見到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呀？想啊，想啊，慢慢地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袁闕成啊，袁闕成，你太不知足了，主席那么忙，怎么能有時間会見你呢？虽然如此，却总不喜欢打消自己的这个美好念头。

一九六〇年，党讓我参加中国文联會議，我日盼夜想的願望实现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我和两千多位文学艺术界代表一起会見了我們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两千多顆火热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两千多双激动的眼睛，閃着幸福的泪花，暴风雨般經久不息的掌声，异口同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震天的欢呼，迎接我們領袖的来临。

走过来了，走过来了，在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一个偉大的十分魁梧的形象向我們走过来了。是真的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袖口擦了擦由于欢笑和过分激动而流出的幸福的眼泪。真的，我們偉大的領袖，祖国人民的救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毛主席，笑容滿面，頻頻向我們招手致意，慢慢地走过来了。

主席同我們一起合影，从照片上看我虽然和主席相距挺远，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主席的身边了。会見毛主席，这个

終生难忘的时刻，永远刻在我的心里。现在每当我看到我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浑身便充满了力量。他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我将牢牢记住党的教导：高举說新书的紅旗，以評书这种文艺武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大 学 生

駱 国 翹

一列从哈尔滨开往沈阳的客車，奔馳在辽闊的平原上。

在一节車廂里，有八、九名青年男女，他們都是剛剛从大学毕业走向各个工作崗位的。他們情不自禁地輕輕唱着：

我們迎着东方的朝阳，
勇敢地踏上生活的道路，
献出自己的青春，
去为祖国建設服务……

歌声，迎着車窗外襲进来的秋风，蕩漾在車廂里。

車窗旁，坐着一个高个青年，他两眼注視着窗外那一片又一片的麦浪，臉上虽然看去很平靜，可此时他的內心，却如漲潮的大海，在翻滾着。

他第二次从挂着的綠色帆布兜里，又掏出那个长方形的硬折来，在鮮紅的封面上，是两行燙金的宋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

翻开硬折，里面杏黄色道林紙上写的是，

賈明元，男，三十歲，一九六二年度于本校五年制修了，經考試成績及格，特發此畢業文憑。

東北林學院

賈明元這個大學生可不是一般的大學生，他的歷史應該這樣寫：放牛娃，羊倌，包身工，大學生……

那是動蕩的一九四〇年，山東省的安邱縣不斷地受日本鬼子的洗劫，人民遭受空前未有的塗炭。在王鳳莊的村頭，有一架用蒿草抹着黃泥搭成的瓜窩棚。這就是賈明元的家，他和爹娘以及三個妹妹就擠在這架窩棚里。遇上陰雨天，外面大下，里边小下，外邊不下，里边滴嗒。窩棚里始終充滿着潮濕味，草地上的毒蛇，常常爬進窩棚里，把那溜滑的身子搭拉在棚頂上。夜里，一群群餓狼，發出陣陣“森”人的嚎叫聲……

冬天，西北風攪着雪團子灌進來，窩棚里挂上了一層厚厚的冰霜。全家只有一床破麻花被，蓋在三個妹妹的身上，夜里，明元常常凍醒，嗚嗚地哭起來，這時，娘解开衣扣，用前胸來給他取暖。

明元爹，成年累月給地主扛活，三十幾歲的人腰就彎了。春天，明元和娘到野地里去挖刺菜，齊齊毛，婆婆丁。秋後，野菜吃光了，就去擄樹叶子。明元娘的臉經常腫得嶄亮發青。明元的肚子里總是咕嚕嚕山响，大便時往外拉綠水。就在全家被飢餓逼得處於絕境的時候，明元爹忽然失蹤

了。明元娘抱着不滿一生日的妹妹，在村子里挨戶串家打听，也沒有下落。从那以后，明元見娘的眼睛紅肿了，每夜都坐在窩棚外面，呆呆地望着。

这时，地主和債主們象催命鬼一样，盯到明元家来討債。明元娘被逼得无奈，把六岁的大女儿卖了。

路，越走越窄。日子，越过越穷。明元二妹妹病得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躺在窩棚里哀求說：“娘，我长这大，还没吃过肉，給我一块肉吃吧！”娘听了，抱起二妹妹，眼泪象下雨一样，嘩嘩地流下来。娘环視着窩棚里的每一件东西，那床破麻花被，杏条筐，搜草耙子，破葫蘆瓢……最后把眼光落在灶坑旁的那只水桶上，这是全家最值錢的东西了。娘一狠心讓明元把这只水桶卖了。

明元卖了水桶，拿着錢便往集上跑。十几里路远的集市，他一口气就跑到了，用卖了一只鉄桶的錢买回来四两馬肉。当明元回到家，太阳已經落山了。他走进窩棚，見娘正在哭呢。妹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些麦草，那焦黄的小臉露在外边，薄薄的小嘴还微張着，明元“哇”地一声扑到娘怀里，手里的那块馬肉落在地上……

一九四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爹忽然回来了。原来爹是被反动派抓去当了劳工，現在偷着跑回来的。在家里是生活不下去了，一天夜里，爹領着一家老小，逃到青島，进了日本人招工的地方。

哪知道，逃出虎口，又进了狼窩。日本人招来了上千的

中国工人，圈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么多的人，每天早晨只給两筐窝窝头。不久，日本人便把他們装上一艘运煤的輪船，沒有船艙，只有两丈多深的装煤池子，人們到里面全身滾得象煤球一样，只有牙是白的。船里沒有厕所，也沒有水，途中死了人，就扔进大海里。在煤船里整整滾了一天一宿，才到了大連碼頭。

明元全家被送进了沙河口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住的就是那駭人听聞的“紅房子”。明元見那四周高大的圍牆上面拉着鉄絲网，門口还站着两道崗，不觉有些毛骨悚然。

明元和爹两人被工头带进一个大工棚子里。一进屋便聞到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发暈。差不多每个工人身上都长了瘡，生了疥，往外流膿水。晚間，每人一碗发了霉的高粱米飯，一块长滿了綠毛的烂咸菜，涼水管够。明元一路上也沒有吃着飯，着急地吞进一口，一陣恶心差点吐出来，說不出是酸臭苦辣，究竟什么滋味。他往碗里一看，呀！里面还有不少蛆。旁边的一个工人捅了他一下，說：“孩子，这里天天是这样飯，你沒听人說嗎？‘紅房子，万人坑，进到这里沒自由，高粱米掺蛆虫，早晚把命丧里头’。”

夜里，不时地傳來女工被工头侮辱后凄慘的哭叫声，洋鎊把打在人身上的“啪啪”声，挺不住私刑的哀叫声……这里的夜，使人感到战慄和恐怖。

天要亮还未亮时，明元忽然听到棚子里发出来一陣似狼

非狼、似狗非狗的嚎叫声，他偷偷地往发出声音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一个工头伸着脖子在“嗷嗷”地叫着。工人们一个个都醒了。接着，整个棚子里，响起咳嗽声，各种呻吟声，有人累得起不来，腰和腿一伸，全身骨头节啪啪山响……

不一会，一群手拎洋镐把的工头，冲进来乱打一气，把人象赶羊一样，撞了出去。

到了现场，包身工照例是要干最累的活，一筐一百多斤的大青石头，压得明元直打晃，喘不出气来，走那几丈高的窄跳板，掉下去就得摔死。每走一次，都吓得他出一身冷汗。每十几名工人，就有一个工头监视，不准随便上厕所，大小便要请假，分批去，限定时间。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

红房子，
包身工，
拉屎撒尿半分钟。

……………

一九四二年夏天，红房子里发生了传染病。每天拉死尸的大车，就象往上落劈柴一样，装得满满的，绳子往上一捆，车后面用绞棍棒使劲一绞，就开走了。

一天，明元爹正干着活，日本鬼子医生来给他一“相面”，便说：“你的，传染病的有！”几个工头马上把爹拽走，送“医院”去隔离。那是什么“医院”？工人叫它“炕

洞医院”，都說：“炕洞，炕洞，送去沒命。”到里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爹剛剛被送走两天，最小的妹妹死去了。娘一股急火，也病倒了，一天晚間，娘去茅房回来，只觉得天昏地轉，眼前发黑，一头扎在地上。明元和妹妹俩，摟着娘的脖子把娘翻了过来，只見娘两眼发直，嘴里往外流黄水。明元和妹妹两人放开嗓子拚命地喊：“娘，娘！你……”娘苏醒过来，吃力地伸过胳膊摟住了妹妹，另一只手攥住了明元的手，无力地說：“孩子，娘……娘苦了你們，不能再拉扯你們了……”說到这里，娘扶着明元掙扎着站了起来，她踉蹌地迈了几步，尽力支持着身子，她那两只失神的眼睛，直盯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多么願意再多看他們一眼啊！明元仰起头，喊了一声：“娘！”娘的滾热的泪珠烫在他的臉上。娘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見的声音囑咐道：“孩子，你爹要是能回来，千万告訴他，領你們……逃……”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說完，娘就倒下了。

明元和妹妹趴在娘身上，放声痛哭。在紅房子里，这样的哭声何止一处？这样的惨事何止一桩？

夜間，明元常常是睡着睡着就“騰”地蹦起来，赤脚跑到外边，大喊着：“娘，娘啊！”

寒风专扫独根草，严霜单打秋后虫。

不久，明元和妹妹都病了。他俩被隔离在一間板棚子里。这里全是得病的工人，有的已經直挺挺地死在那里了。

夜里，明元正在昏迷中，进来一个老工人，用针给他兄妹俩放了放血。第二天，明元兄妹俩觉得身子轻松多了。

一天夜里，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道清亮的闪电划过，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闷雷，把整个板棚子震得颤动着。狂风，吹折了窗外的杨树枝子。妹妹吓得紧紧地搂住了哥哥。就在这时，明元觉着头上有一只水淋淋凉冰冰的手，他抬起头，借着一阵闪电光，看清了站在面前的这个蓬头垢面的人就是自己的爹。明元心里一阵惊喜，这不会是做梦吧？他使劲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脸皮，觉得疼痛，他刚要大喊一声“爹！”不料爹用手捂住了他的嘴，爹轻声地问：“娘呢？”明元一听爹提起娘，抑制不住的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爹不再往下问了。

当天夜里，从“炕洞医院”逃出来的爹拉着明元兄妹，顺着工棚爬到了围墙下。围墙上的铁丝网，已经被爹来时剪断了。爹把绳子拴在明元兄妹的腰上，把他俩一个个拔到墙上，再慢慢地放下去……

从死亡里挣脱出来，爹拽着明元兄妹俩，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拚命地朝着北面跑去。天亮时，跑出了大连市。妹妹再也走不动了，爹背着她，三个人钻进了山沟。就这样，爬山越岭，一路上要着饭，走了半个多月，到金县的十三里台子落下了脚。爹到石灰窑子去给地主扛活，妹妹给了一家姓赵的巫婆做童养媳，明元给姓徐的地主放牛，讲好放两头牛一年三十块钱。

到了秋后，姓徐的地主只给了他二十块钱。明元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多放了两头牛反而少给十块钱？”姓徐的地主把眼珠子一翻楞，说道：“你给我丢了一个牛籠套，扣去十元，难道不是理所当然？”明元根本就沒见过牛戴籠套，后来他忽然想起来，原来牛脖子上有一个麻繩头丢了，难道一个繩子头能值十块钱嗎？姓徐的地主洋洋得意地说：“咱这儿就是这个規矩，天下富人少，穷人多，哼，缺你这个豆包一样吃干粮，不干，你滚蛋！”

数九寒天，明元被撵出来了。他无处可去，一个人晚間蹲在草垛里，白天到村子里要飯，再不就在雪地里拣豆叶子吃。

第二年开春，明元又到一个姓張的地主家干活。这人吃得肥头大耳，自称为“張善人”，又是村长。这“張善人”非一般地主可比，他雇人到大連、沈阳各地去做买卖，县城里拷“镰刀魚”的警察狗子，經常聚在他家里喊“俩好”“八匹馬”。

明元上工不几天，“張善人”听说他娘死在大連，便問道：“埋哪啦？”明元說：“不知道。”“張善人”說：“看，你家不但沒有坟塋地，人死了連尸首都找不到，这是前生注定，人，不信命不行啊！”他又沒板沒眼地哼起来：“騎馬坐轎修来的福，推車肩担命里該然……”明元听了，气得心里罵道：“你个老不死的！”这个“張善人”只有一个儿子，娶了个少奶奶三年沒生孩子。他老伴每天燒香念

佛，并讓他多修点好积点德，将来有个孙子也好傳宗接代。

“張善人”一听也对，可是对誰去行好呢？他想起自己有二十多号伙計，都是穷人。給他們点好的吃吧？不上算，多給他們几个工錢吧？舍不得。稀里糊涂过了一年多，少奶奶居然生了一个男孩子。知道底細的伙計們，常常議論：他們这个輩数可該怎么个論法呢？每逢“張善人”的儿子抱着孩子屋里院外顛喝着，伙計們看見，背后都說：“嗨，又把他弟弟抱出来了。”这就是“張善人”的“德性”。

一晃来到了年关，明元給“張善人”放了二年羊，沒見“張善人”給一个子儿。腊月天，明元还穿着一条露屁股的单褲，他在前边走，村里的小孩在后边唱：

小羊倌，
上山坡，
露着腩，
打哆嗦。

明元闖进上房，找“張善人”要工錢。“張善人”把那張窩瓜臉往下一拉，不悅地說道：“你在我这里有吃有喝还要什么工錢？我他媽的不收下你，你这个‘海南熊’早喂狗啦！”明元說：“我要錢买条褲子穿！”“張善人”一听，說：“那好办。”說着从柜里找出一条破褲衩，扔給了明元。明元起早貪黑干了二年，就算賺到这一条破褲衩。

“張善人”还有比这更損的事。长工老王是个好打头的，論起庄稼活来，不管哪一样，都是手拿把招。因为受不

住“張善人”的刻薄，老王提出不干了。“張善人”留不住老王，便想出个損招来。一天，他把明元叫到上屋，厉声說：“老王偷羊毛的事你知道不？”明元說：“我不知道。”“張善人”說：“告訴你，你就是証人，到時候你頂不上去，就扒了你的皮！”

第二天，外面下着鵝毛大雪。明元被地主的儿媳妇領进上屋。他一进外屋地，就听里屋那張破鐵嗓子在嚷：“你說不說？”接着便是老王的声音：“姓張的，你不要血口噴人，賴我偷羊毛有什么證據？”這時，地主的儿媳妇在后边抽冷一下子把明元推了进去。“張善人”一見明元进来，便对老王說：“他就是証人！”又問明元：“小羊倌，你說，是不是他偷了羊毛？”

明元站在那里，想起老王处处象亲人一样照顧自己，有时他干了一天活，晚間还用那粗硬得拿不住針的大手，一針又一針地給自己縫补衣服；每晚睡覺时，老王都要把破棉袄脫下来給自己压脚；他到山上割来靛鞣草，把它捶軟乎給自己絮在靛鞣里……

“快說！”“張善人”把桌子拍得快要散架子了。

明元猛地大喊一声：“我不知道！”抹身便跑了出去。不一会，只見老王披着破棉袄走了出来，他用感激的眼光，对着明元点了点头，便走了。随后，“張善人”气势汹汹地出来，冷不防一把掐住了明元的脖子，一手把他的头往青磚墙上使勁撞。“張善人”一边撞一边罵：“你这个‘海南熊’，

媽的吃我的喝我的，反倒不听我的！”这时，“張善人”的儿子也提着根拳头粗的棒子赶上来，对准明元的鼻子就是一棒子，明元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明元醒过来。他怀着满腔仇恨，連夜逃出了張家的大門。

到哪里去呢？明元从打和爹分手后，三年多未見面了。找爹去！明元整整走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终于在大地主王福升家里找到了爹。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天下富人一样狠，正当天明父子俩吃早飯的时候，大地主兼村长王福升派人把明元抓走，送到金县龙王庙，当了劳工。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明元犹如一只出籠的小鳥，不顧一切地向前跑着，穿过沒頂深的谷子地，趟过清澈的小河。太阳，暖煦煦的，豆地里的蝻叫成一个响。明元有生以来第一次心里这样舒暢，第一次感觉到大自然是这样美，連空气都似乎比往日充足而新鮮。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岁的賈明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部队里，他蘊藏在內心的复仇的火焰，变成一团階級仇恨的烈火。他懂得了自己的仇人不仅仅是一个“張善人”和一个王福升，而是整个地主階級、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賈明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燒

到鴨綠江邊。這時明元經過在部隊里學文化已能讀懂《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他心中燃起了怒火，多次要求入朝參戰。十一月，他終於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

在朝鮮，不論在瀰漫着炮火硝煙的戰場上，或是在彎曲的坑道里，明元一直沒有放下他的書包。

一九五二年的春天，他在朝鮮患了病，組織上把他送回祖國治療和休養。在醫院里，他最喜歡到閱覽室去看畫報和小人書，也非常想看看那厚厚的一本又一本的藝術書籍。一天下午，他走進圖書室，借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通俗本）。他翻開第一頁看下去，不知不覺竟翻過了二十多頁，他已完全能看懂了，這是他有生以來讀的第一本小說。他激動，興奮，感到很幸福。他多麼愛書啊！現在他才發現，原來書里有那麼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麼多自己喜愛的人物，那麼多動人的故事情節，還有那優美的語言，哲理性的句子，他一次又一次讀也讀不夠。有一次他借了一本大部頭的《母親》，從此他知道了高爾基，接着他又讀了《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

賈明元不愧為階級的戰士，祖國的好兒子。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鬥爭中，他立過四次功，被評為三等模範，得過兩枚獎章。

朝鮮停戰談判以後，一九五三年的七月，黨決定送他入工農速成中學去學習。這個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要去上學念書了。過去，他幾次被地主打得死去活來，剛強的明元，沒

有掉过泪，可是今天，他却流下了感激的眼泪。他不能不想啊，过去在村子里，眼巴巴地瞧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有一回他去哀求爹说：“爹，我也要去念书！”爹抚摸着他的头叹了口气说：“傻孩子，咱们头顶着人家的天，脚踩着人家的地，手端着人家的饭碗，连个家都没有，怎么能有钱念书呢？”从那以后，明元再也不敢有上学的念头了。

明元从长春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东北林学院。他那在瓜窝棚睡在草叶子上被冷风刺惯了的身子，今天，竟坐在温暖明亮的大学课堂里。他那长满了硬茧握惯了牛鞭子的手，今天，居然握起了英雄牌的金笔。笔呀，笔！你使明元产生多少辛酸的回忆啊！明元是贾家世世代代第一辈拿起笔使唤笔的人。明元爹一生就拿过一次笔，那是一九四一年在青岛，爹拿起笔在“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契约书上划了押，用那支笔卖掉了娘和妹妹的两条命。可是今天，明元拿起了笔，要用它来为人民服务。

火车徐徐开进了站台，沈阳到了。明元止住了思路，他发觉自己的两眼被泪水弄模糊了。他擦干了眼泪和同学们一齐走下火车。明天，明元将要到沈阳机车车辆厂去报到。

国庆节前夕的沈阳的夜晚，呈现一片欢乐的气氛，明元不觉唱了起来：

我們迎着東方的朝霞，
勇敢地踏上生活的道路，
獻出我們的青春，
去為祖國建設服務……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

女 教 授

朱贇平 胡清和

海，有时藍得出奇，象一片藍天；有时黑得如墨，象看不透的烏云；有时金光閃爍，象瑰丽的朝霞；有时浪花滾滾，象起伏的云层。海啊，多么美丽、多情，而又奇妙无穷！它曾引渡多少滿腔热情的青年，去远洋，追求知識、真理；又引渡了多少滿怀壮志的人，重返国土，实现自己的理想、願望！海，你怎能知道啊，在那漫长的黑夜里，人生的道路也有狂风暴雨，也有万頃恶浪！

一

远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吳淞口海港显得霧气茫茫。这时，有一艘从美国旧金山駛来的远洋客輪，緩緩地拋錨停泊了。一群旅客迫不及待地換乘一艘引渡到上海外滩的小型客輪。

在人的潮流中，有一位并不引人注意的女子。她，二十六、七岁，神态穩重、沉靜；中等身材，体格瘦弱，穿一件米黄色的旗袍。端庄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明淨的眼鏡，藏在

眼鏡后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她吃力地提着一對小皮箱，穩步地踏上了小客輪的甲板。然後，她小心翼翼地將皮箱放在自己的腳邊。皮箱里藏着滿滿的科學書籍和講義，還有一本《居里夫人》。這些，就是她仅有的財產和心愛的物品。

小客輪向外灘駛去。黃浦江水在身下飛濺；大陸在望了。這位女子，望着漸漸隱現出來的上海外貌。喜悅嗎？不，家鄉淪陷，山河破碎，有何喜悅！悲哀嗎？不，遠洋留學，重返國土，怎能悲哀！她望着，望着，專注地望着，象要一眼看清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前途！

高聳在海關的大鐘，正在一聲一聲地響着，如怨如訴，宛如向歸來的人們訴說祖國的不幸。她默默地听着、听着，那未盡的余音，引她沉入了往事的思念。……

她，侯毓汾，出身在無錫的一個獻身給教育事業的老教師的家庭里。她的家境並不十分富裕。四年前，她從上海大同大學畢業的時候，對人生還沒有什麼經驗，對祖國的科學事業，抱有一個遠大的理想。為了能到國外去學習，她教了兩年書，省吃儉用，積攢下了只能購買三等艙的船票錢，渡海到美國密歇根大學去留學。

侯毓汾進入了密歇根大學的化工系。第一天晚上，她望着異國的星空，一夜也沒有睡好覺。她興奮啊！她有強烈的求知欲望，她以為這一下总算邁進了科學的宮殿。

可是，她所帶的錢，並不够她長期深造下去。她要交學

費，就不能吃飯；要吃飯，就不能交學費。在那個金錢萬能的國度里，生活的困境開始威逼着她。沒有辦法，她只得半工半讀，在一個美國教授的家庭里帶孩子。當她剛找到這份工作的時候，不免有點惶恐、憂慮。因為，她自己還是一個剛離開父母身邊的孩子啊！現在，竟然要她去為別人帶孩子，她怎麼能做得來啊！還有，當保姆常要說的一句話，“噫，乖孩子，莫哭啊！”她怎麼能說得出口啊！

侯毓汾被強烈的求學願望沖動着，只得硬着頭皮，踏進了美國教授的家門。這家女主人是一個飽食終日的婦女。侯毓汾永遠也忘不了她那副刻薄相。每當孩子一鬧，那個女人就要以一種傲慢的神態，向她投一白眼：“你就是沒有耐性！”

侯毓汾帶孩子的時間，是早晨六點到九點，下午五點到九點。這樣，上午的第一堂課，她就不能參加。課餘的時間，當然是全被那個美國孩子所占有。她只有在深更半夜里，苦讀着那一本又一本的厚厚的講義。而這時候，美國的大街上正是燈火明晃，遊人眾多。那高樓，那舞廳，那酒館，那劇院，處處都飄蕩着靡靡之音。侯毓汾在這樣的環境里，以自己特有的沉靜和毅力，排除着生活上的煩惱、學習中的困難。她靜心地讀着一本書，這是一本精裝的英文版《居里夫人》。她要學習居里夫人那種對待科學的敢于追求、敢于探索、敢于研究的精。並且，她還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寫下了《孔子世家贊》中的名句：“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侯毓汾在密歇根大学苦讀了两年，获得了碩士的学位。由于經濟困难，再也无法获取博士的学位了。她結束了留学的生涯，也結束了保姆的职业。她滿怀着激情，从国外回来了。她要将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才能，献給多灾多难的祖国。

“姐姐！”

侯毓汾被这一声熟悉的、亲热的呼喊惊醒过来，只見她的弟弟站在岸上，向她揮手。

在回家的路上，她从弟弟的口中，知道全家在无錫淪陷后，就迁居到上海租界里了。这一夜，合家团聚，是侯毓汾两年以来最愉快的一夜。父母亲慈祥地望着她，問长問短，好象永远看不够，也永远談不完。她躺在自己的家里，既舒适又溫暖。但是，她一想起山河破裂，日本鬼子奸淫燒杀，已經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不由得又增添了一种忧虑的心情！

二

侯毓汾回国后，最渴望的就是要在科学事业上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学的是有机化学，凭她的学历和水平，可以到科学研究部門去工作，到大学里去教学。然而，那个花花綠綠的大上海，是冒險家的乐园，是寄生虫的福地，却不是侯毓汾能

找到工作的地方。事实上，这又何止是侯毓汾一个人呢？大学生拉黄包車，留学生拆字卜卦，游蕩的失业人，又有多少啊！

后来，侯毓汾在上海女中、进德女中等学校教課。当她教历史課的时候，她不得不去翻閱那些記載秦始皇、汉高祖的傳略。而这一切，与她所熟悉的标有拉丁文符号的化学葯品，那清澈閃光的玻璃器皿，那摆滿科学仪器的实验室，又怎么能合到一起呢？她实在不能再教下去了，便辞职了。

侯毓汾在极度的煩惱下，又不得不带着那一本《居里夫人》，来到昆明。

当时，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季。侯毓汾由亲友介紹，到昆明电工器材厂当助理工程师。侯毓汾知道，这是一个专业生产电气材料的工厂，与自己所学的有机化学无关。但是，她听说这个厂有一个技术室，那就可能有一些試驗設備，她便来到这个厂的試驗室工作。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侯毓汾渐渐地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一个組工作的同事，竟不知道对方所做的具体工作。組长从来不宣布，同事也从来不交談。当別人搞試驗的时候，她偶然走了过去，搞試驗的人就会急忙嘻笑着向前迎阻，或是迅速地收藏起試驗資料。

“这是为了什么啊！”为人質朴、正直的侯毓汾，对这种现象感到惊奇，而又难以理解。后来，她明白了：这个进行科学試驗的場所，也成为勾心斗角的天地了。

因处于抗日战争动荡时期，不久，厂里靠外国进口的电气绝缘材料来源中断了。试验室负责人便交给她一大堆试验项目，要她从云母中解决电气绝缘材料。侯毓汾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只要求给派一个得力的助手。

整整一夜，侯毓汾全是想着云母问题：它的形状，它的岩层，它的花纹，……几乎都在她脑子里活现起来了。

第二天，厂方派给她的助手来了。她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侯毓汾望着那个年幼单纯的孩子，不得不抑制个人气愤的情绪，耐心地带着他，搞起重大的科学试验来。有多少次，在试验中，那个孩子拿错了化学药品，使得侯毓汾急不得又慢不得，哭不得又笑不得，只好自己跑来跑去。

侯毓汾当然不满这个环境，不满当时政府摧残科学的态度。但她还是坚持着试验，终于利用西康的云母，试验成功绝缘材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人向她祝贺，也有人对她赞扬；但是在背后，却有更多的人开始攻击她，排斥她，贬低她试验的成果。搞科学的人，自己真正搞出了一项科学试验，反而成了一种罪过，这得怎么解释啊！

这个时候的侯毓汾，对科学工作的满腔热情逐渐消失了。她觉得这个明争暗斗、丑事百出的试验室，绝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所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因此，她离开了这里。

三

一九四四年秋天，侯毓汾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化工系任教。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到了贵州，她又不得不带着她的《居里夫人》跟随学校转移到重庆。

侯毓汾到了重庆，又接受了唐山交通大学的聘请，教矿冶系无机化学和土木系普通化学的课程。但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重庆的大学并不比贵州的大学强。她所任教的唐山交通大学，竟然连做实验用的玻璃杯、玻璃棒都没有。

经过侯毓汾多次的交涉，校方才拨给一点钱。侯毓汾把钱放在手心里，掂量了又掂量，核计了又核计：能买些什么呢？如果买玩具倒也够了；但这是添置科学仪器啊。

没有办法，侯毓汾只好拿着那几个钱，从丁家坳连走带坐车，赶到重庆市内，买些玻璃管、玻璃杯、烧瓶、酒精灯……。然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怕碎怕打的器皿，回到学校。她把这些仪器，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摆布起来，还占不满一张桌子，不是缺这，就是少那。

傍晚，侯毓汾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了交通大学的一座破旧的楼房。这是一所二层楼，而身为大学教授的侯毓汾，却是“高高在上”，竟住在天花板与屋顶下的夹层中间。住这种“夹楼”，头上顶着瓦，脚下踩着天花板。跺一跺脚，天花板就会忽悠悠悠；直一直腰，头就会碰着瓦。屋里又闷又热，又阴又暗，只有一股昏暗的光线，透过屋顶上的两块

明瓦，映照下来。

这时，虽然还不到明灯点烛的时候，但是，侯毓汾顺着楼梯爬上来进得屋里，就不得不照例先点起桐油灯。她默默地望着床头上那本《居里夫人》，脸色渐渐地显得有些苍白了。她在俯首深思中，往事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又一幕一幕地迅速破灭。她发觉自己已经是在一条死胡同里。

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是侯毓汾的苦闷却没有消散，她又从重庆的码头，慢步踏上停在江畔的一艘客轮。她沉静而又忧郁地望着滚滚的长江，往日的理想、抱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四

一九五〇年春。一日，有一列浅绿色的、从北京开来的直达快车，徐徐地停在沈阳车站。车刚一停稳，从车门里就拥挤出来一群喜笑颜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响应祖国的号召，从南方来到北方，要以满腔热情建设祖国的东北。

侯毓汾随着人群走出收票口，望着繁华而又庄严的工业城市，在她那副沉静的面孔上，流露出了难以克制的笑容。

一辆从东北工学院开来的汽车，把他们载走了。

侯毓汾被接待到事先给她安排好的宿舍里。来探望她的，是一些陌生但又十分热情的人。那些老师与同学与她畅谈之后，从她房间里散去，已经是深夜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上海解放以后，她觉得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面前，她激动了，她再也不能安于家乡的那个小天地了。她那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愿望，时时刻刻地在鼓动着自己：走吧，走吧，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吧！但是，十年前所学的东西，已经有些荒疏了。于是，她又打扫了那些已经落满了灰尘的科学书籍和讲义，还有那本久已搁置起来的《居里夫人》。当她翻看那本书的扉页时，一眼就看见自己写的《孔子世家赞》中的名句：“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最后，她终于离开了任职多年的竞志女中，参加到建设祖国东北的行列，重新踏入科学的大门。

由于侯毓汾是研究有机化学的，东北工学院成立了染料专业教研室，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个多么巨大的鼓舞啊！当她第一次走进洁净的实验室，她不能不被那些犹如珠宝闪光、琳琅满目的仪器怔住了。在这些闪光的仪器中，她仿佛看到了党和政府对待科学事业的严肃态度。她，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抚今追昔，怎能不激动得两眼湿润啊！

好消息，总是鼓舞人心的。一九五二年，侯毓汾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看到了自己在十年前试验成功的云母绝缘材料，在解放后已经由东北的一个工厂投入生产了。当她正在体会过去从未享受过的快乐的时候，好消息又接着传来了：在旧社会里，与她共同试验五倍子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徐僖（现任成都工学院教授），解放后由于党为这项工作

办了一个試驗工厂，他终于将五倍子塑料試驗成功了。还有許許许多多的好消息，都是那么令人兴奋、鼓舞，过去不能实现的願望，現在都变成了事实。面对今天的现实，她更进一步認識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剝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偉大的祖国才能真正地繁荣富强起来，科学事业才能随之昌盛！她决心听党的話，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

过了一些时候，侯毓汾被調到大連工学院工作。学院的领导，在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过去有誰对她这样信任呢？又有誰对她这样器重？她高兴，她激动，她觉得自己絕不能辜負党对她的期望！在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侯毓汾逐渐地認識到自己从前所走的路，是多么狭窄呀！居里夫人那种独创的精神，只不过鼓励自己去作一番个人奋斗。今天，在党和同志們的帮助下，她的思想領域变得开闊起来。她所想的，再不是为了个人爭得个科学家或是名教授的称号，而是党所交給她的培养青年一代的任务。这群青年，是未来攀登科学高峰的尖兵！作为老一輩的教授、科学家，她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更重了，要为后一代負責的地方更多了。在她的身上，好象增添了一股无穷的力量。她努力地、忘我地工作着，除了完成繁忙的教学工作而外，还担任了系副主任和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但从不叫苦，觉得自己能多做些工作，是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疗养院疗养的时候，她还趴在病床上，为学生們逐字逐

句地修改学术論文。对于那些青年講師和助教，侯毓汾更是給予多方面的帮助。当青年女講師丁素心开始講第一課以前，侯毓汾犹如自己备课一样，替她搜集外文资料，为她审查講稿，并且还在課堂里听講，課后提出具体意見。

侯毓汾教授，这位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高级知識分子，由于党的培养，和她自身的不断改造，終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她站在党旗面前，望着眼前一片庄严的紅色，不由回想起以往，她的心怎么能平靜下来！

侯毓汾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她在全国染料化学教学和研究方面，虽然是一个有声誉的教授和专家，但她却是处处謙虛，做事同群众商量，生怕个人給党造成不良的影响。在生活 and 工作中，从不摆教授的架子，什么事情都去做，只要对党、对大家有利。

五

一九五八年，正当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她与程侶柏、楊錦宗以及教研室的全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敢于創造、敢于发明、敢于探索的革命精神，繼上海有机化学工业公司之后，試驗成功了活性染料。染料的品种，不断增多，相繼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被中央化工部、紡織工业部举办的全国活性染料經驗交流会所选用。

由于侯毓汾十多年里一直是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創

造性地劳动着，又在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在人们爱戴之中，连续被评为旅大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一九六〇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一九六一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并且出席了最近两届辽宁省党代会。

现在，侯毓汾除了忙于教学工作之外，仍然继续试验活性染料的其他品种，和深入探索染料化学方面的理论问题。

已经五十岁的侯毓汾教授，在工作之余或假日里，仿佛还没有忘记二十多年以前，曾经引渡她去远洋的大海；她常常到海滨游览，眺望……

海，还是那样，有时蓝得出奇，象一片蓝天；有时黑得如墨，象看不透的乌云；有时金光闪烁，象瑰丽的朝霞；有时波浪滚滚，象起伏的云层。海啊，是多么美丽、多情，而又奇妙无穷！侯毓汾凝视着这波澜壮阔的大海，她那内心的激情，犹如海潮般地涌动起来；只有党啊，人们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党啊，科学教育事业才能闪光。

一九六三年八月于大连

桃李只等春风开

刘 湛 秋

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在本溪太子河边上，有一个穿蓝布衫的青年在徘徊。他猛地拣起一颗石子，扔进水中，溅起一片水花。他望着水花逐渐地消失，觉得自己的希望也象水花一样消失了。

他，二十岁的程博普，伪满本溪师范讲习科的应届毕业生，今天就要告别太子河上的母校，开始自己人生的旅程。这几年，他曾经多少次下课后漫步在这岸边，编织着未来生活的理想，可是，一切都破灭了。象许多同学一样，他也没有得到工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样遭到毕业即失业的命运。

他站在太子河边上，忍不住眼圈红了，孤独地默默地流着眼泪。

为了工作，他三番五次地跑伪县公署。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他才得到到万柳河小学任教的委任。万柳河离本溪有一

百四十里路，接近新賓縣。上路那天，他父親把他送到牛心台。分手的時候，父親老淚縱橫，拉着他的手不放：“孩子，只好讓你去了。安頓好就來信吧，免得老人牽挂。唉，爸連個毛驢都雇不起……”他看着父親這樣子，便安慰說：“嗨，我又不是去當兵，是去做事，哭什麼？”當他走了很遠，翻上一座小山，回頭還看見父親站在那兒。他一狠心又往前走了。

翻山越嶺，渡過滿是冰碴子的河流，一道又一道。這天下午总算來到了全部希望的所在——萬柳河。當他走進村子時，他的褲腳已凍成了冰坨。

他從內衣里掏出那張委任狀。村長只掃了一眼，冷冷地說：“小學的事，我們還沒一定呢！你先到學董那里去吧！”

轉眼一個月過去，一天，村長和學董把他找了去，村長說：“學校就要開學了。”他聽了這話，心里真高興。可是頓了一下，只聽得村長又說：“不過我們村不能用你，我們這兒老師還沒事干呢！”他急忙爭辯：“我有委任狀，是縣里委派來的。”村長從鼻子眼里哼了一下，說：“委派不委派，咱們管不着。”希望破滅了。

第二天學董便讓他走，說：“把這一個月的店錢算一算吧！”程博普覺得門外一下子刮進來一股北風，直抽到他骨頭里去。失望和氣憤，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二

毕业快一年了，他才又給派到大南沟去。他去了，开了課。可是前后只两个月，学校就“黄”了。他去找村公所領两个月的薪水，回答是：“哪来的錢，沒有！”但他几次三番地去要，后来总算有了答复：“錢是沒有，实在要，咱們这里出煤，給你两車煤吧！回去拿家什来取。”程博普听这么一說，真是哭笑不得。可是，第二天，当他背了几个麻袋去时，煤也不給了。沒奈何，他只好把麻袋原样背回。一路上他觉着这空麻袋象有千斤重似的，比装滿了煤还压得胸口痛。

为了弄个能領到薪水的地方，第二年春开学时，他从家里好賴筹借了十来元錢送礼，才被派到了小孤山。

工作，对剛出校門就受到重重打击的程博普有着无穷的誘惑力。工作，意味着有了飯碗；工作，意味着独立的生活；工作，意味着他旺盛的精力有了發揮的地方。他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当他第一次来到学校，站在那只有三間破旧的房子前面，他的心几乎顫抖了。他望着教室，桌椅殘缺不全；他摸摸窗台，沾了一手灰尘；他喊了一声，里面也沒有人回应。他知道他将担負起学校的全部工作，教书，行政工作，干勤杂活，看管桌椅板凳，甚至做飯挑水，都得他一个人去做。但是他全不計較这些，他真想对着这空蕩蕩的校舍大喊一声：程博普有了工作啦！

小孤山的早晨是靜悄悄的，但是四、五点钟他就睡不着

了，他要起来给自己做点吃的，烧点开水，把有些地方打扫一下。接着从学校门前响过去车铃声，牲口哐哐的叫声，他就又抄起课本，拿到院子里来看。这时候，他的小屋还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呢！白天他忘记了一切，他从这个教室走到那个教室，上完了语文又去上算术，教完了美术又去教体育。在孩子们的眼里，这个个子不高的瘦瘦的青年老师，无论冬夏穿得都是打着补丁的蓝布衫，对人总是满面笑容，讲课时总是大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们许许多多的练习题。只有到下晚，程博普把孩子们送走以后，做完一顿饭，带着被烟火熏得火烧火燎的干眼走进小屋时，才能舒一口气；他伏在炕上倒上一会，很快又坐起来，把油灯点着，拉过厚厚一迭练习本，揉揉自己睁不开的眼睛，手捏着红笔，开始批改作业。

不久，孩子们发现，他们喜欢的程老师的腮帮逐渐瘪了下去，讲课的声音也小了。坐在后排的学生有时举起手来：“程老师，声音大点，听不清楚。”听到这话，程博普真是恨自己，怎么搞的，自己精力不中啦！但是一大声朗读课文，他就觉得他的胸口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塞着，偶尔还刺得发痛。

有一天早晨，他觉得喉咙里发痒，就咳嗽了一下，这时候他看见从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痰，而是鲜红的血。他完全明白了，肺病——这个旧社会穷教师的职业病，终于也罩在他的身上了。但他依然打起精神，照样满面笑容地走进教室，给孩

子們講語文。這一堂課，他不得不把聲音放得很小很小。接着，第二堂給三年級上語文。朗讀時，他只好大聲領孩子們念。讀了一半時，他覺得喉嚨里涌出來一股發腥的東西，他趕忙咽到肚里去，繼續領孩子們念下去。朗讀完，他放下課本，輕輕地對孩子們說了句：“同學們，你們先上自習吧！”就回到了寢室里。他渾身難受，熱呼呼的。這時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是這樣孤單。有誰來幫他一把呢？雖然他的家離這兒只有十幾里路，但是他不能回去；他甚至無力把老婆接到這兒來照顧他。他坐起來，摸過壺想倒杯水，但壺是空的——他忘記他今天沒燒水了；只好跑出來在水缸里舀了瓢涼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後又一步一步地邁進教室去。

幾天以後，學董把他找去了，對他說：“你講課聲音這麼小，是不是有病？”這句話簡直象晴天霹靂一樣打在他的頭上，他知道這“有病”意味着什麼。他慌忙說：“沒病，沒什麼病，前幾天受點風，着涼了，有點咳嗽。”從此以後他更加提心吊膽了。他忍着痛在課堂上大聲講，更不敢有一天缺勤。說什麼這個飯碗也不能丟了啊！

過不多久，他接到視學來查學的通知，告訴他準備準備。他知道這“準備”是什麼意思，可是他身邊沒錢，只有憑自己勤勤懇懇地教學來挺過這一关了。

第二天早晨，一個長得胖胖的視學來了。一進屋見他趴在炕上，就厲聲地說：“學生都來了，怎麼還不去？”他說：“我今天不舒服，現在上自習呢！您……您要不要聽課

或是抽考？”“哼！”視学走了。下午，又来了一趟，見程博普毫无表示，扔下一張表叫他填，就走了。

晚上，他对着孤单的油灯，听着窗外的风声与附近小河的淙淙流水声，感到特別的寂寞。他拿过学生的練習本，望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一刹那間，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样歪歪扭扭。他一头扑在桌上，面頰上挂滿了眼泪。

三

放假了。这又給他带来一重煩惱。下学期的飯碗問題怎么样？今年的暑假，尤其令他担心。

每到假期，伪县公署的接待室里，总是挤滿了教員。有的是来打听下学期能否保住飯碗的，有的是失业一年半載来請求委派的，还有的是新毕业的师范生等派工作的。

他也不断地跑伪县公署。……

果然，这年暑假，不出他所料，他被解聘了。

他回到家。晚上，他老婆坐在他跟前，許久地望着他，說：“瞧你瘦多了，別管有事沒事，上‘奉天’去看看病吧！”程博普叹了口气：“唉，看什么，看得起嗎？”他老婆默默地伸出手，把結婚时的那对銀鐲子捋了下来，噙着眼泪交給他：“明天把它卖掉，到‘奉天’去看看吧！身板要紧。”

就这样程博普带了十几块钱到了沈阳。一走进医院他就明白了，凭他这几块钱想要治病，那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可

是既然来了，还是得看看，他只好挂个号。大夫看他这一身衣服，就断定他是看不起病的，草草地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说：“有点肺病，不太严重。”开了几服药，告诉他常常用热水敷胸口就行了。他拿起药方，在药房前转了几圈，问明白他带来的钱够用时，才把药方递进付药的窗口。

他在家失业一年，第二年又筹了些钱，送了礼，才又被派到兴隆山小学。

四

日本投降了。他以为阴暗的天空会出现亮光，也许中国会富强起来吧。可是，没多久，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来临又撞碎了他的美梦。本溪，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国民党官僚简直象粪坑里钻出来的屎克螂一样，漫天臭气。这些大员们从天上飞来，从地上爬过来；名义上是接收，实际比抢劫还疯狂。到工厂——抢劫，到矿山——抢劫，到商店——抢劫，到学校——还是抢劫。谁管建设呢？一个个比赛，看谁最先塞满腰包。物价天天飞涨，流通券，法币，金圆券，象走马灯似的乱转，恨不得把老百姓的骨髓都吸去才甘心。

这时候教育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了。程博普工作的林家小学虽然照常开学了，但是没人管。原来五月份开始发薪，结果到七月份才发，照样是二千九百元月薪，但连五月份的九百元也顶不上。以后连一元钱薪水也没有了。

一九四七年程博普转到了兴安小学。这时国民党更要出

新花招：小学薪金改由地方支付。放暑假了，老师们只领来了一些户头，上面说：“由这些老百姓家出钱。”

程博普和老师们不得不背着口袋挨家去要。到一个学生家了，他苦笑了一下，先问问学生情况，然后就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对方马上就明白了：“哎呀，程老师，俺家的日子也不好混了，孩子今年不念书啦！”他摇摇头，走掉了。

这时他的孩子增加到了两个，父亲又老了，不太能干活，家境越发艰难，一家人连豆饼都吃不上顿。

有一天，他到街上去。本溪街上更不成样子了，满街都是乞丐，到处是衣不蔽体的饥饿的人群。忽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程老师！”他转身一看，在一个地摊后蹲着一个满脸黑胡碴，衣服破烂不堪的中年人。他摆的地摊上只有几支铅笔、小本子，还有点核桃什么的。他端详了很久，才想起来：这不是后街的郎老师吗？他摇摇头说：“郎老师，怎么落成这个样子？你摆这些东西连本卖掉也不够吃呀！”郎老师叹了一口气：“落成这个样子？也比教书强啊！多少还能对付碗糊涂喝。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本溪街上老师干什么的都有哇。”接着郎老师又告诉他，谁现在卖破烂，谁在大街小巷给人擦皮鞋，谁在街头摆写信摊子。当程博普听到这些，不由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这可怕而冷酷的世界，究竟要把他们挤到哪儿去呢！

还是回学校吧，不教书又能干什么呢？说不定挨到放假能多少拿点呢！他又回到了兴安小学，教了一学期，到寒假

还是一个錢沒拿到。

一線希望也沒有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老師們都陸續離開學校，自找生路去了。他沒奈何也卷起行李，決定離開這教書生活了，而且要永遠永遠離開。

十五年的教書生涯，嘗盡了苦辣的滋味，到頭來還是回老家，只落得一把辛酸淚！他回頭望望那暮色蒼茫中的學校，狠狠地說了一句：“就是累死餓死在地里，也不當這教書匠了！”

五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紅花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本溪解放了。共產黨、八路軍對程博普來說並不太陌生，光復後本溪一度解放時他不在學校，回來還給發了五個月的工資。現在是永遠解放了。他那沉鬱的心又活躍了起來，他開始想念他的教育生涯。他準備等安定一兩個月，再到教育局去打聽一下。出乎意料之外，本溪解放後不到半月，他就在家裡接到了請他回校的通知。他收拾了行裝，第二天就趕到了興安小學。當他看到學校那紅旗招展的熱烈氣氛，看到孩子們又天真活潑、興高采烈地背着書包來上學，他心裡真高興。他發覺，他自己是多么熱愛教師這職業，對這些孩子他是懷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他過去恨的不是教師，不是學校，而是吃人的舊社會。那可怕的十五年，是永遠過去了，從今天起他才第一次真正當上人民的教師。

从一九四八年到今天，一晃又是十五年。这两个十五年是多么不相同。那时候他正二十几岁，可是弯腰驼背，满脸黑胡，贫病潦倒；现在他五十了，可是步履刚健，精神抖擞，朝气蓬勃。那时候他有病不但没钱治，甚至都不敢说出自己有病，生怕因病而摔掉了饭碗；现在他有病，不但照发工资，而且享受公费医疗，他解放前得的老胃病也在一九五四年彻底治好了，肺病也一直沒有再犯。一九六二年他爱人有病，花了些钱，政府还给了他救济金，保障了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年来一直沒闹过病。他说，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老越年轻。

那时候每逢放假他提心吊胆，放假就是失业，现在他的职业得到了保障；过去教书上班拿不到钱，现在放假工资还照发。放假的时候，他可以安心地休息，养好精力迎接新学年。假期，他常常有机会学习，提高思想与业务能力，有时还去休养或参观。一九六三年，市教育工会就请他到温泉寺养了十几天。现在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两个大孩子都已经上了高中。过去他连自己一个人也养活不了，现在他的一家虽然八口人，但是生活无虑。领导上还常来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

过去，他教书是为了混碗饭；现在教师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他是区人民代表，最近又被选为区人民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一个教师，他过去最伤心的是地主有钱人家的子弟

大多不用功，但还得年年升学，成績不好，老师也不敢叫留級；而那些好学的大都家境貧寒。每到假期，总有些学生来跟他說：“程老师，我下学期不能来念了，家里人手不够。”他有时到学生家去說：“你孩子多聪明，讓他念吧！”但学生家长只能报以苦笑：“沒法子，念得起俺还不叫孩子念！”程博普老师很惋惜这些学生，有时帮他們买书本、文具，但这些学生还是不能念到毕业就辍学了。每一年，他亲眼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不得不放下书本去給地主放牛、扛活。这些含苞待放的桃李，沒等开花就給霜打萎了。

桃花，杏花，什么时候才能开放呢？

解放了，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国家培养下成长。他現在担任复兴小学的副校长，十五年来經他培养的学生有七、八百，真是桃李滿天下了。这些学生有的在念大学，有的已經参加工农业生产，有的参加机关工作，有的和他一样，也在培养新的桃李。这些学生常来看望他，从沈阳、兰州、大連、吉林都有他的学生給他来信。

今天，这些桃花、李花开得多么美丽啊！

編 后 記

这本书，是繼《關关东的那一輩人》后編的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第二集，定名为《从黑夜到天明》，意在通过新旧社会对比，說明祖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們不能忘記过去的苦，要更加珍惜今天的甜，为更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本书选入作品十二篇，力图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反映各阶层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遭遇的苦难，以便使多方面的讀者能够受到教育。

辽宁日报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二月